

FD &

金融与发展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www.imf.org/fandd

2007年12月号

非洲缺少的因素
后向预测：拉丁美洲
对 Michael Kremer 的采访
Johnson 论粮食价格
援助流动资金瞬息图



全球治理： 谁在掌控？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7 - Chinese



MFICA2007004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Laura Wallace
主 编

Camilla Andersen
Jeremy Clift
Elisa Diehl
Archana Kumar
James Rowe
Si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Lai Oy Louie
美术编辑

Lijun Li
Kelley McCollum
Randa Elnagar
编务助理

编辑顾问
Francesco Caramazza
Adrienne Cheasty
Alfredo Cuevas
Domenico Fanizza
Andrew Feltenstein
Paul Hilbers
Paolo Mauro
Adnan Mazarei
Thomas Richardson
Jerald Schiff
Jan-Willem van der Vossen
Jeromin Zettelmeyer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07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Telephone: (202)623-8300
Facsimile: (202)623-6149

Website: <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5 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036
网址: <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特 辑

全球治理,谁在掌控?

10 全球治理:新参与者、新规则

为什么20世纪的格局需要重新改变

*James M. Boughton*和*Colin I. Bradford, Jr.*

15 次级债:一次危机的触痕

抵押市场遇到的麻烦与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一旦
崩溃可能带来的坏账一样多

Randall Dodd

22 全球贸易管制

在过去50年支撑世界贸易的多边体系正面临严
重挑战

*Uri Dadush*和*Julia Nielson*

26 未来的金融危机

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传染性危机和19世纪90
年代个别国家的危机具有相似性?

*Paolo Mauro*和*Yishay Yafeh*

31 全球医疗卫生治理

如何更好地协调才能改进全球医疗卫生状况进
而提高资金利用价值

David E. Bloom

36 观点: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坏了吗?

三种关于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如何改善的观点

Joe Cerrell、*Helene Gayle*、*J. Stephen Morrison*
和*Tore Godal*

其 他

39 后向预测:拉丁美洲

回顾一个最具波动性地区的商业周期需要重构
GDP数据

Luis A.V. Catão

44 非洲缺少的因素

针对保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援助如何才能
做的更好

*Abdoulaye Bio-Tchané*和*Etienne B. Yehoue*



22



31



44

其他内容

- 2 读者来信
- 4 简讯
- 6 经济学人物
Arvind Subramanian对
Michael Kremer的采访
- 20 图表释义
改变援助面貌
Stefano Curto
- 49 书评
贫困的持续：
为什么富裕经济学不能帮助穷人，
Charles Karelis
让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持续发展学框架和实际应用，
Mohan Munasinghe
骚动的年代：
新世界的冒险，
阿兰·格林斯潘
非洲的发展：
了解问题与行动者的意义，
Todd J. Moss
直面困境：
我们是把中国视为伙伴来拥抱还是将其
作为敌人来面对
Will Hutton
- 54 直言不讳
Simon Johnson：(粮食)价格的成功
- 56 国家聚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57 2007年文章索引

美术作品：封面和第10页，Terry Widener；第39页，Lai Oy Louie。

摄影作品：第4页，Simon Maina/AFP；第5页，Juan Carlos Ulate/Reuters；第6页，IMF图片；第15页，Duncan Hale-Sutton/Alamy；第22页，Paul Souders/Corbis；第26页，Maxim Marmur/Getty Images；第31页，Bagus Indahono/epa/Corbis；第44页，Gideon Mendel/ActionAid；第49—54页，IMF图片。

调整还是大修？

国际圈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全球性问题——艾滋病、贸易争端、气候变化、金融传染以及很多其他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否已经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毕竟，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模式基础上的，具有被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的特点。不过，在数十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出现了区域性力量甚至全球性力量这一新的特征。

本期《金融与发展》试图进一步促进对全球治理的讨论，通过询问包括IMF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学、金融、贸易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专家来探究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什么对此没有影响。一个持续的主题是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近几十年来在所有地区取得的进展，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决策制定方面必须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本期开篇文章《全球治理：新参与者、新规则》中，作者提出，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全球社会共同改进二战后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重要。这些改进包括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减少贫困、扩大不会加剧气候变化的安全清洁能源的供应，以及降低医疗卫生风险。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进一步完善目前存在的多边制度，以及创造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

在金融方面，我们意识到未来的风险，这些风险大多与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金融风险一样，很可能带有传染性，也就是说足够的流动性将是一个问题。近几年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的危机——这次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弱点——使得关于是否应该对国际金融流量进行管制以及如何进行管制的讨论成为热点。

在国际贸易方面，我们认识到全球贸易体系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新的挑战在于如何管理贸易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2%增长到2005年的32%，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5%——以及处理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还没有完成的自由化进程的敏感性。

在医疗卫生方面，我们知道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健康的三个目标——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医疗卫生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都没办法实现。根据《全球医疗卫生治理》一文作者的看法，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全球医疗卫生治理体系对不断变化的大量行为没有足够的了解，以及无法保证一些医疗卫生问题能公平、有效、高效地得到解决。很多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都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从更好地监视疾病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

* * * * *

本期《金融与发展》的“经济学人物”介绍的是与全球医疗卫生及经济事务相关的哈佛大学的Michael Kremer，他为一个要求发达市场做出承诺的机制铺平了道路——这一机制目前已经在肺炎球菌疫苗的研制中发挥了作用，肺炎球菌在贫穷国家每年夺去近一百万儿童的生命。

Laura Wallace
本刊主编

来信

读者

女性权利

我非常同意 Mayra Buvinic 和 Elizabeth King 在《聪明的经济学》(2007年6月号)一文中提出的应该更努力提高妇女经济权利这一观点。如果妇女们都尽了全力,她们是家庭甚至国家的生力军。妇女在对话方面也非常出色,并在不断进步中。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三个目标(目的是提高妇女权利)应该得到支持,但是相反的是“妇女生来就是做家务的”这种观点必须首先废除,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

Agonma Esaie
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
贝宁

道德责任

《让汇款为非洲的发展做出贡献》(Sanjeev Gupta, Catherine Pattillo 和 Smita Wagh, 2007年6月号)一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仅是因为我生活在第三世界,并且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原因,还因为这篇文章客观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惊人的现实情况。

尼日尔正从汇款中受到越来越多的益处,这些汇款使得收到汇款的人们开始有能力改变生活。如果使用得当,这些钱真的有助于减少贫困。例如,在2005年的食品危机中,尽管散居在国外的尼日尔人寄回来的汇款数目与发展伙伴提供的援助相比非常小,但却使收到的人免受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我惟一的不满针对汇款公司,其纯利润有数百万美元,而这些利润都来自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移民的汇款。这些公司应该负起道德责任,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以示回报。

Hassane Moussa Alkeirou
尼日尔

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虽然我非常喜欢 Harry Broadman 写的《将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2007年6月号),但是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两个大陆之间的贸易有利可图,可非洲国家出口的农矿产品是工业生产和消费的投入品,反过来再进口亚洲的制成品。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

亚洲很多国家正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尤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这种发展的推动力来自新的创造财



富的工业、领先的服务行业、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改善了的资源分配、健康的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最终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政治稳定等因素。相反的,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很多农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增长。石油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多数非洲国家,工业部门对GDP的增长贡献率非常小,金融体系低于正常水平,糟糕的治理结构几乎在哪里都是一个问题。

为了保证非洲国家不会沦为纯粹的农矿产品供应者,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一些迅速的、明智的决策。他们应该开放金融体系以服务于外国直接投资,制定鼓励中小规模企业的政策,鼓励新技术的应用。他们还应该积极争取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最后,他们应该执行一套有效的反腐败的政策。

反过来,亚洲国家应该取消限制非洲出口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如果双方都能够拿出真正的决心,“动态二重唱”将会享有更长远、更和谐的伙伴关系。

Sofiane Abouderaz
Boumerdes 大学讲师
阿尔及利亚

移动着的中国人

Ulrich Jacoby 在《携手并进》(2007年6月号)一文中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和非洲之间伙伴关系的基础。但是在描述两个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时,作者好像没有注意到在非洲的中国移民这个问题。除了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外,目前,大量的中国移民也涌入了非洲。

举例来说,喀麦隆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的一个极佳的目的地。问题是当地居民认为这些中国移民对他们的生活理想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增加了失业,并且失业已经到了令人头痛的水平。这种情形更加令人担心,因为中国人创造的任何工作机会同时又被中国人占去,雇用当地人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

Ongba Joseph Juvet
Ngaoundéré 大学, 经济系学生
喀麦隆

捆绑式援助的成本

在阅读《携手并进》一文时,我有一种强烈的之前阅读过它的感觉。交钥匙项目在非洲有很长的、失败的历史。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援助明显是和中国企业及中国产品绑定的(根据这篇文章中写到的,安哥拉的贷款比例是70%)。对这种绑定成本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很多论述认为它的额外成本超过了筹资的优惠。如果在捆绑式援助中还要求必须从相同的供应商

那里购买昂贵的替代配件的话，成本将更高。

可能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捆绑式援助成本的研究，但在提到这种绑定时却没有标明根据历史经验它可能带来高成本的话，肯定是错误的。虽然没人希望如此，但是如果机会是由通过捆绑式援助带来的过高价格而创造的话则令人意外。

Charles Harvey
布莱顿，英国

发掘隐藏的珍宝

Bob Traa 和 Alina Carare 合写的《政府净资产》(2007年6月号)一文对公共财政中隐藏的财富——也包括隐藏的问题——进行了适时的讨论。印度财政部认真地编写了一份自1947年以来的公共资产和负债表。这份平衡表显示，印度实际的负债大于资产——这是多年来财政赤字的结果。不过，其中有些资产的价值没有正确评估。比方说，国有企业资产以市场价值计算的话可能比官方账面上的要高出很多。不幸的是，当考虑卢比的市场汇率时，负债项反映了外国债务的低估。

除此之外，这份平衡表根本不为众人所知。媒体、分析家和其他评论家都将焦点集中在财政预算上，只关注其中的税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传统事项。但是印度这些隐藏的资产也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如果发掘了这些机会，对帮助印度为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而制订的那些规划将是有效的支持。

另外，这篇文章中论证的那些工具可以帮助确认邦政府层面上与资产和负债黏合更紧的威胁。

G. Giridhar Prabhu
《经济研究》理事
印度，芒格洛尔

考虑环境因素

从《政府净资产》一文中我得出了一些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根廷)以及它们如何解决补偿环境性公共物品等方面的结论。

阿根廷政府的净资产受到投资者信心丧失的影响，并因为以外币计算的名义债务的增加以及金融资产价值的下降而进一步恶化。不过，不可再生的环境性资产的消耗也在影响公共部门的净资产。这个问题也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趋向过高估计投资收益的影响，因为他们通常不会将环境恶化考虑进来。

当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公共部门的净资产时，为恢复环境财产而进行的投资也应该被计入。第一步，这些国家应该在资产平衡表的资产项一边将为补偿环境性公共物品而设立的自筹的储备金包括进去。

留出保护环境的资金显然会影响到公共部门的资产平衡表，固定投资贬值带来的成本以及为保护环境而发生的实际支出都会影响净资产。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不善势必继续影响政府的运行资本，进一步侵蚀政府的净资产，最终影响到金融市场，减少在公共部门的投资。

Nicolás Antonio Piccione
阿根廷经济学博士

欢迎来信：

欢迎读者来信，内容不超过300字。

来信请发至：fanclletters@imf.org,或致函本刊主编。

地址：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我们将对您的信件进行编辑。

关于
全球化及
其对世界范围
经济影响的
新闻和
分析

IMF 调查

访问 IMF 调查在线杂志，
请登录

www.imf.org/imfsurvey

制图

IMF“数据制图器”是一种新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工具，它支持网页访问者选择和比较各个国家、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关键数据。通过点击鼠标，“数据制图器”就可以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中选择数据，并以图表和地图的格式显示出来。这个制图器——10月17日上市，与IMF公开发行的WEO是同一天——内嵌了最新一期WEO中的关键指标和数据。您可以通过访问IMF的国际网站 www.imf.org 获得更多关于数据制图器的信息。



快就是最好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出警告，禁止从环境保护地区空运有机农产品可能使该地区本来就脆弱的人们陷入困境。贸发会议说，一些北半球生态集团提出的禁止通过空运进口有机农产品的建议可能不会减弱气候变化的影响，反而，禁令可能摧毁第三世界，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产品种植者和出口商。

“欧洲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是非洲有机产品增长的主要原因”，贸发会议宣称，“新鲜的水果蔬菜尤其依赖空运，如果没有空运，非洲生产的这些容易腐烂的产品就不能及时地送到欧洲。”贸发会议断定，这些空运商品贸易为那些生态印迹与发达世界相比非常微弱的农场主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它还说，贸易是分享源于碳的利用而产生的财富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且，有机农场隔绝碳的能力不断提高带来的环境好处更有利于农场物种的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质和土壤结构，降低能源消耗。

2007—2008年大事记

- 2007年12月4—20日，法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
- 2007年12月3—14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努沙杜瓦
联合国环境变化会议
- 2008年1月23—27日，瑞士，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 2008年4月12—13日，华盛顿特区
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 2008年4月20—25日，加纳，阿克拉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十二次会议
- 2008年5月18—19日，乌克兰，基辅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8年年会

洲际联系

如果最近IT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得以实施的话，到2012年，所有非洲国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都将通过宽带信息技术连接起来。在卢旺达基加利的一次IT峰会上，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确认了建立泛非洲大陆宽带连接的事务。

全球的开发机构、IT公司、5个非洲国家的首脑以及50多个国家的IT部长参加了10月28—30日的峰会。参会

代表被告知，泛非信息高速公路的第一阶段是铺设南非和苏丹之间的东非海底光缆，这条光缆将为至少23个非洲国家提供快速、便宜的带宽。



肯尼亚内罗毕的手机使用者：新协议的目标是在2012年实现非洲主要城市之间电子化的连接。

峰会的参加者还得知，连接整个非洲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而且还将为通信，例如移动电话带来突出的好处。即使非洲具有全世界最高的连通成本，但农场主和老师之间可以依靠移动电话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峰会的参会代表还被告知，移动电话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民主，它使得选举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

吸引人的非洲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报告中指出,2006年流向非洲原材料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贸发会议的年报《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资主要是流向非洲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公司。此外报告还指出,非洲不断增长的服务部门——尤其是交通、仓储和电信行业——也在继续吸引投资者。然而,有限的生产能力导致流向非洲制造业的投资相对较少,纺织行业甚至出现撤资的现象。

报告认为,投资流的快速增长部分地反映了非洲国家已经开始了向外国投资开放经济的步伐。具体的措施包括减免税收、建立特别投资区、加强投资促进、鼓励开展新业务,以及简化注册手续等。然而,也有一些国家颁布了一些不利于外国投资的规定,例如征收版权税、扩大国有企业的垄断、限制汇款,以及给国内私营企业以优先权等。



在哥斯达黎加 Rio Frio 率先实施新项目的一家锯木厂试图利用加工剩余木材残渣中的能源。

烧掉与利用

在哥斯达黎加实施的一项将木材废渣转化成有利润可赚的环保能源的工程或许给发展中国家帮助战胜全球变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一直在支持这个项目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认为,这项先进技术

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哥斯达黎加在工厂里将锯屑和其他木材副产品制成压缩球,作为替代传统燃料的一种新的能源。在很多国家,锯木厂产生的多余的木材残渣要占用巨大的空间,也往往对当地的河流造成污染。木渣腐烂同时还会放出沼气,这是导致环境变化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温室气体。另外,这些木屑残渣能够自燃,从而带来火灾风险。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指出,哥斯达黎加的这个项目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沼气排放,另一方面以可再生的木屑球替代传统的燃料。粮农组织补充说,通过这种类型的项目减少的排放可以以每吨大约相当于10美元的价格进行二氧化碳排放交易。

IMF 书架

The CFA Franc Zone Common Currency, Uncommon Challenges



Editors
Anne-Marie Gulde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 共同的货币, 不寻常的挑战

IMF非洲局中大约1/3的国家是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的成员。随着多数其他国家开始放弃使用固定汇率,寻找一个合适的能确保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很明显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兴趣。然而,在公共出版领域内几乎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这本书希望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它综合分析了在地区监管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采取的各种努力,突出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果各项协议要进一步推进的话主要的政策要求。这本书是集合了IMF一大群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外部专家的意见,基于实证研究而成。

价格: 37.50 美元, 英文版 ©2007, 大约 300 页, 平装

ISBN 978-1-58906-675-5. 订购存书号 # CFCZEA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需要订购, 请登录 www.imfbookstore.org/pr/p0712CFA-FD 或者发邮件到 publications@imf.org, 并注明商品广告号 P0712CFA-FD。

理想主义 对思想的 利用

Arvind Subramanian对
Michael Kremer的采访

经济学中的思想有时能够激发政策，政策又可以提升出更好的思想。但是由理想主义激发出的思想，然后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追求这些思想的情况却是少见的。但正是这些品质成就了Michael Kremer，哈佛大学发展协会的“Gates”教授，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认为他与众不同。

Kremer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同事和共同作者 Abhijit Banerjee 解释：“当大多数经济学家想出一个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主意时，他们会认为自己一定是错了，否则这些主意没有等到他们想到的时候早就发挥作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忘掉这个念头，尽管很不情愿。Michael 却立刻开始想怎样才能使这些想法变为现实”。

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其聪明才智和不知疲倦的公众信仰为他铺平了道路去创造一个被称为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新机制，这个机制可以进一步研发出新疫苗来抵抗肺炎球菌疾病，这种病每年将



夺走贫困国家百万个孩子的生命。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理论的大家、Kremer 在哈佛时期的导师这样说：AMC 的思想“可能给世界上最需要的国家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Kremer 还在实证发展经济学领域引进了一个主要的方法创新：公共政策干预的随机评价。这不仅在学术上帮助重建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它还督促了世界上的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严肃地评价其行为和行为之后的结果。他还做出了其他重大学术贡献，许多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找到协同工作（尤其是在国际层面上）提升穷人的福利水平的途径。与其共事的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奖的得主 Amartya Sen 强调：“Kremer 在经济理论与复杂的经验技巧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成功地把这种结合应用到发展经济学的关键的政策问题上”。

现年 43 岁的 Kremer 在堪萨斯州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到南亚和肯尼亚的旅行——在那里他花了一年



的时间向学生教授数学和科学并且在偏远的肯尼亚西部的一个缺乏资源的学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引发了他对发展的兴趣。Kremer 通过正在运营的世界教学组织（这个组织每年派送 370 名教师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包括像马歇尔岛这样的地方）继续其肯尼亚经历。他又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获得教授职称（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在哈佛获得）。

为穷人提供疫苗

2007年2月，五个国家——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俄罗斯和英国——和比尔和米琳达·盖茨基金宣布他们将投入 15 亿美元到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见专栏1），去帮助生产一种对抗像肺结核和脑膜炎这样的肺炎性疾病的疫苗。这种历史性的宣布使已经在这个方面研究数年的 Kremer 激动不已。

一旦疫苗被生产出来，先前承诺的为挽救生命的疫苗支付将会刺激生物工艺学和制药公司去生产可以在贫困国家适用的和可以负担起的疫苗。一直到今天为止，为穷国生产疫苗被认为是一项糟糕的商业

投资，公司不情愿将资金注入到那些消费者能够支付很少的疫苗的研发上。根据世界银行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估计显示这个承诺可以阻止到 2030 年大约 540 万儿童的死亡。

如果这种方法确实起作用的话——并且这是个重大的设想——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每年夺走 2000 万生命的疟疾和其他疾病将能够解决，并且这种方法甚至可以扩展到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改革的技术。

当 Kremer——他在肯尼亚感染过天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通过许诺购买以前已经被生产出来但没有被严格试用的疫苗来促进研究和发展的思想还没有受重视。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首先发表在 1998 年的一篇被《经济学季刊》杂志出版的关于专利完全购买的学术论文中。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且在 2000 年在《创新政策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为这个问

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后来在与妻子 Rachel Glennerster 合著的《强大的医学》这本书中详细地阐述了更多细节。实践设计的复杂问题挑战人的智力：哪些疾病应该被囊括？候选疫苗的合适与否如何被决定？如果多种疫苗被生产出来会怎么样？疫苗接受国也需要做出贡献吗？公司应该被允许生产一种疫苗的多大份量？

但是指出这些分析被证明是非常容易的部分。Kremer 投入将近 10 年去宣传其思想并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学者、制药公司、政府和政策制订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对这个项目激动不已，但 Kremer 依然保持警惕。为了达到成功，必须以正确的框架启动——不是小事——并且如果这个思想被扩展到其他致命性疾病，成功也是必然的。

一种检验思想的新方法

在经济学领域，Kremer 最出名的是努力帮助研究者决定“真理”——也就是说，在竞争性理念中寻找冷静判断的方法。数年来，经济学家利用其他领域（比如医药）被称为“黄金标准”的方法进行随机试验。这些试验涉及随机选择两个大组，仅仅一组进行“治疗”，然后比较效果。事实上，这种方法被用于评价著名的墨西哥 PROGRESA 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向送孩子入学的

专栏 1

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是什么？

一个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目标是为将来的疫苗创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大到而且可靠到刺激在疫苗研究方面的私人投资并且加速其开发和生产能力，以制造主要是用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疾病的疫苗。

一个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需要赞助者（或者捐赠者）以法定金融承诺方式、先前已经同意的金额去支持市场。参与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的公司有义务以担保价格提供成功研制的疫苗。建立一个独立的调整委员会去决定疫苗是否符合那些标准。接着，只要发展中国家有有效需求（就是说，这些国家表达引进疫苗的意愿），公司就能够以已经商议的价格从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得到资金。

一旦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资金枯竭，在承诺条款之内，公司确保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承担的较低长期价格（即“尾部价格”）供应疫苗。当引进疫苗时，发展中国家也被期望对疫苗的成本做出贡献（“共同支付”），一直到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耗尽资金为止，随后，以一个长期较低价格（可能与共同支付价格相同）购买疫苗。

家庭转移现金。那个计划的理想效果为其他国家实施类似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但是 Kremer 的真正贡献是显示这些试验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去做。它不必仅仅局限于有巨大预算的政府评估特殊项目。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NGOS) 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对这些问题使用一系列方法, 比较在相似环境下不同方法的成本效率, 阐明特殊项目的影响, 同时阐明较大的潜在问题。他显示了随机选择可能是低成本的——考虑到医药方面昂贵的花费——和灵活的, 当评价政府政策或干预时, 这种灵活性很难获得。

Kremer 发现随机评估的思想几乎是偶然的。在 1995 年, 当一个朋友提到他曾经工作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帮助七所学校建造更多的教室和提供教材和制服时, 他正在参观肯尼亚的一个村庄。Kremer 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考虑分阶段采用这些随机的新“干预”对研究效果的影响。后来在一篇使用随机化技巧的论文中, 他和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合著者 Ted Miguel 认为用去虫药对儿童的大量治疗已经减少了 25% 的学校缺席率, 并且比其他提高出勤率的方法更有效 (见专栏 2)。

另外作为一种方法创新, 随机选择也有巨大的影响, Kremer 及其合作者所做的实验产生了对发展政策具有价值的经验, 常常颠覆了传统智慧。例如, 传统提高教育和卫生保障的方法常常不能运作并且有时由于扭曲基本系统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 在肯尼亚, 教材的供应仅仅提高那些在课前预习学生的分数, 可能由于许多学生在官方课程上已经落后。并且学生一教师比例的下降没有导致测试分数有大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在学生一教师比例下降之后, 教师不会改变他们的针对较多学生的教学方法。

相反, Kremer 及其合作者发现提供对供应者激励的项目更具有前途。例如, 在肯尼亚被学校委员会雇用的合同教师有可能比专职雇用的文职教师更多地在课堂上出现, 尽管其收入仅仅是文职教师的 1/4, 并且他们的学生在测试中做的好的多。哥伦比亚一个为贫困家庭送子女入学提供优惠购物券的项目带来了在学习中的大收获和很高的学业完成率。哥伦比亚的健康保障服务合同在健康服务提供方面巨大的改善就因为已经签订合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用以表现为基础来奖励健康工人的方法。

这些论文中根本方法论的创新带动了真正的家庭手工业, 在经济学方面几乎是一个新的学科。随机选择不仅仅用于解决教育和健康供给方面的问题, 而且用于更加广泛范围的问题上, 包括新工艺采用的决定、分散化的效果、控制腐败不同方法的效率以及移民的影

响。事实上, 怀疑随机评价影响的迹象已经出现 (见专栏 3)。

复兴微观发展经济学

不管随机选择的讨论如何, 毫无疑问, 随机选择将依然是实验经济学家工具箱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发展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将可能采用这种方法评估其项目, 进而从将来的努力中总结教训。并且这种方法的引入有助于复兴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

Kremer 提到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很少有同事从事这个领域, 最好和最聪明的同事都涌入到传统的国际经济学或者劳动经济学或者金融领域。在今天像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 发展经济学吸引了那些在以前从不会考虑这门学科的学生。Kremer 及其剑桥大学的同事 Banerjee 和 Esther Duflo 在这个领域的普及起到了关键作用。

Kremer 认为其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在传统上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创建设计市场的方法。例如, 他提出贸易许可倾向于逃避并且常常对被许可

专栏 2

随机选择: 新术语

随机试验的目的是确保结果是实际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的结果。一种做法是随机决定逐步采用干预的次序。一个丹麦的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组织在肯尼亚西部除虫努力的案例中大约 3 万个在 75 个小学学校的儿童被治疗。由于财政和行政的限制, 治疗必须逐步进行。

Kremer 和 Ted Miguel 认为应该随机逐步进行。通过按字母顺序把学校分成三组并且把每 1/3 成一组。对第一组的除虫治疗在 1998—1999 年进行, 第二组的除虫治疗在 1999 年进行, 第三组的除虫治疗在 2001 年进行。1998 年第一组的学校出勤数的结果可以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校相比较 (他们作为控制组), 1999 年的第一组和第三组学校的结果可以与第三组的学校结果相比较。

这个结果显示了除虫改善了儿童健康并且因此减少了 25% 的儿童缺勤率。有趣的是, 不仅那些接收治疗的学校缺勤率下降, 而且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学校由于健康 (已经治疗) 儿童的感染减少缺勤率也下降。事实上, 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能够相当精确地分辨出“外部因素”——也就是说, 健康和教育收益甚至扩展到那些没有接收治疗的地区。

国家的公民利益和独裁者或者他们所针对的政权损害一样多。相反，他和斯坦福大学 Seema Jayachandran 提出预期贷款许可。

例如，如果在一个富产石油的国家发生政变，联合国安理会宣称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将来贷款将被认为是对政变领导人的贷款而不是后继政权的贷款，由于银行知道后继政权将有可能拒绝还贷，因此不愿意借款给许可政权。公民将减轻还贷负担，比如种族隔离的南非或者图季曼的克罗地亚，这已经引起了金融萧条或者对独裁者有利。

移民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许多富裕国家正经历反对低技能移民的反弹，把它看作是不平等的表现。Kremer 和 Stanley Watt 认为至少一种形式的低技能移民，即作为女仆和保姆的妇女跨界移民将减少接收国居民的工资差异。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较好的和能够供应起的儿童照料使有高文化水平的母亲重返劳动市场，因此相比起非熟练工人来说，提高市场上熟练工人的供给。

Kremer 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多：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长期关系、大象和偷猎问题、挥霍的独裁者遗留的“恶债”问题（见2002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古董的保存以及参与麦加朝圣的影响。他的一篇早期论文探究了包括一系列任务的产品生产过程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错误将导致产品的毁坏。他认为“O型生产函数”（以挑战者航天飞机灾难的残余部

分命名）能够解释在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程式化事实，包括为什么全球化常常被看成增加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和增加发展中世界的的不平等。这个观点与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预测相反，该模型预测使用非熟练工人将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Kremer 认为其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在传统上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创建设计市场的方法。”

但是 Kremer 复兴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新的方法和对这个学科的重视。作为一个教师和指导者 Kremer 同意做出巨大贡献。一个学生说在同 Kremer 工作的5年时间，Kremer 一直是在48小时内返回草稿。他提到 Kremer 在周末读他的关于市场的论文并且在晚上11点把论文返回到门口，并附有5页的打印好的评论。Ted Miguel 也指出 Kremer 的慷慨和公正。当 Kremer 建议按除虫论文上的字母顺序来决定第一作者时，Ted Miguel 说他很吃惊，因为两人都对“这篇论文做了大量的工作。”

留下遗产

在过去的多年中，Kremer 获得数不清的奖项，包括麦克阿瑟“天才人物”奖，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奖，美国科学最优50人研究奖和美国总统科学家和工程师早期职业奖。但是一个有争议的、对青年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奖他还没有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个奖由美国经济学会授予年龄小于40岁的最好的经济学家。在去年，2004年，这个奖项被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文·利瓦伊获得，其以沉闷科学《魔鬼经济学》这部著作出名。

这两个经济学家是实验经济学的两种有着显著差异的方法的一流开创者。Kremer 是进行随机分组和评价经济政策试验的强力提倡者，而利瓦伊依赖于“自然”试验——这种以“cute-onomics”作为特征的方法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开始受到批判。他们各自遗产的持久性依赖于这两种方法能否在同辈的审视和学术风尚的变迁中存活下来。

Arvind Subramanian,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教授。

专栏 3

随机选择的局限

随机选择的极大优点就是可以产生比较可靠的、Kremer 认为由于透明度能够影响决策者的证据。但是批评认为尽管随机选择在宏观背景对于所提问的问题有益，但它不能解决较大的问题，比如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健康结果的差异是什么，或者哪一个汇率政策比较好。这不仅因为随机试验能够在宏观水平做而且因为政策或者干预有时产生通过试验方法不能获得的“外部因素”。一个例子就是健康在收入方面的效果。在个体水平上，较好的健康将使较健康的人能够较长时间和较好质量的工作从而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人们不能对宏观发现加总因为较好的健康导致损坏整体增长效果的较大人口数量。



全球治理： 新参与者、 新规则

为什么20世纪的格局
需要重新改变

James M. Boughton 和 Colin I. Bradford, Jr.

2007年夏天，美国数百万的私房业主发现他们按揭贷款的条款变得不利，而同一时间内，他们房屋的市场价值正在缩水。房产价值的挤压很快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很多家庭失去了他们的住宅。在数周之内，骚乱迅速扩展到其他具有复杂金融体系的发达经济体，在这些地方，企业和个人发现，贷款获得很困难，并且出人意料地昂贵。瞬间，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受到质疑。

在这个事件上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如此精细，足以厄制风险，并且其散布得如此广泛，足以预防突然出现的流动性枯竭。银行挤提事件是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没有意料到会发生在21世纪。令人并不惊讶的是，一旦该问题产生，在任何国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保护自己不受传染之前，它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当银行危机波及到股票市场后，工业国家股票市场的动摇和对新兴市场也处在危险之中的担心开始产生。

2007年的金融动荡，并不是第一次表明金融全球化是收益和风险并存的。金钱的全球性聚集对于坦桑尼亚的公司，对于越南的农民，对于孟加拉国农村的创业妇女和美国城市的年轻家庭来说，使得他们具备了实现远远超越前几代梦想的可能性。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容易遭受他们意料不到的、很难理解的无形力量改变的伤害，更不用提他们去影响或去控制这些力量了。这种情况下，在危机扩散得更广泛之前，主要中央银行的快速反应有可能将冲击隔离起来。这种情景反映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一个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世界中，存在于一个国家的系统缺陷能够影响到许多其他的市场，监督和管理应被认为是一个全球责任。

当然，国际社会需要牢牢抓住的不仅是金融治理方面的问题。国际贸易壁垒的取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在劳动力标准和其他社会关注的方面提出了棘手的问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需求，

原始生长的阔叶森林遭到破坏，这个环境成本被分摊到全球。更可怕的是，传染性的健康风险是不分国界的，不论是来自艾滋病、结核病或者流感的风险。在每一种情况下，关于谁的福利、哪些权利和什么目标是最重要的等等艰难的决定必须做出。这使得全球治理——不管关于金融、贸易、环境，还是健康——成为当代世界最关键和最困难的挑战之一。

什么是全球治理？

理想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建立合作性领导权的过程，这种领导权促使各国政府、多边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走到一起来共同实现普遍公认的目标。它给出了战略方向，从而整合集体的力量去应对全球挑战。为了有效，它必须是包容性的、有活力的和能够超越民族和部门界限和利益的。它应该通过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来运作。它应该更加民主而不是专制，更加政治开放而不是官僚，更加综合而不是分散。

全球治理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面临的困难上都不是最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胜利的协约国领导人在1919年齐聚巴黎召开了6个月的会谈，主要目标是重新划分世界许多国家的边界和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国联，用来处理未来的问题。超过30个国家派出代表去参加巴黎这个和平会议，但是最具有实力的胜利的四方——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主导和控制着该进程。

25年之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盟军代表再次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代替失败的国联，并且防止出现具备相应特征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指的是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这一时期的经济浩劫。这些历史上著名的会谈大多数在美国举办，并且受到美国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会议分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华盛顿特区的顿巴顿橡树园大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举行，建立了将塑造接下来60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多边机构，它们是：联合国（有安理会及其各专门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这种全球治理的格局成为战后时代占据主导优势的范例，在这种格局中，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国家虽邀请其他国家参与，但从不放弃更多的控制权。

这种体系已经过时

这种全球治理的主导型格局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模式。当20世纪刚开始时，伦敦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中心，到了该世纪中期，这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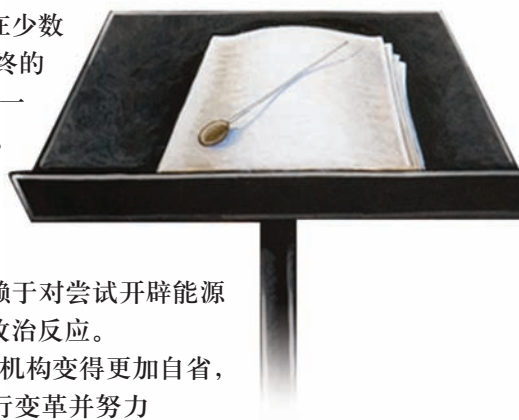
心穿越大西洋向西转移，但是欧—美世界中心变得更加牢固。然而到本世纪末，正在获得力量的周边地区开始成为世界中心。新的区域力量甚至新的全球力量已经上升，并开始挑战旧的力量，但是全球治理系统未能跟上这些变化。

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比如说对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一些国家实施多边制裁，派出多国部队到动乱地区维护和平。这个机构的委员人数在过去的60年没有改变。在这60年，控制放松了一些，但是在其他机构还远远不够。举个例子，1946年美国在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共同拥有略低于50%的投票权。今天，它至少需要8个代表35个或者更多国家的执行董事才能形成多数投票权。虽然仅美国一家就对重大金融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任何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董事联合起来就拥有15%的投票权，从而也能做到这点。尽管如此，在投票权和影响力的分配上还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伴随的后果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越来越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体系，各国政府通过它走在一起来关注全球化问题，但这个体系是零碎的和分散的，没有一个有效的、宽广的视角。就像以前的体系关贸总协定只是处理贸易问题一样，世界卫生组织（WHO）只关注健康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对那些威胁世界和平的情况做出反应，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着国际金融系统。尽管广泛的磋商和合作在这些和其他组织中定期举行，但是每一个组织都在自己的领域独立地开展活动。

总体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多元化的行为者，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有着自己的代理人和支持者，有着自己的技术语言和组织文化，有着自己的要求和专门的关注点。当国际关系主要聚焦于几个重要问题上时，这些特征可能会发挥适当的作用，但也仅仅在少数重要国家。然而，最终的影响是我们继承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体系，并且这个体系严重、甚至非常严重依赖于市场力量和竞争，特别依赖于对尝试开辟能源渠道和分配资源的政治反应。

在这种背景下，机构变得更加自省，越来越关注如何进行变革并努力



改善自身的业绩，而不是关注如何和合作者一起来实现共同的目标。治理结构软弱和过程局限于具体部门，缺乏外向的定位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同部门之间的行动缺乏联系。每一个机构变得没有效率，从而使整个体系蒙受损失。

21世纪的问题和挑战——吸纳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减少贫困、扩大提供安全清洁同时又不会恶化气候的能源、降低健康风险，还有许多其他挑战——需要进行的协调远不是目前的体系所能胜任的。这里的每一个挑战，即使在地方层面或国家层面上的解决办法，也会对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产生潜在的影响。如果不用全球和整体观念作指导，单靠自身专门的技术经验是很难充分发挥作用的。

由于缺乏全面的监管系统而出现的真空部分由各国提议作为世界经济指导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后续的特殊集团（见地图）所填补了。这种尝试随着1962年10国集团（G-10）的建立而开始，该集团由当时主要工业国家组成。在20世纪70年代，其中的一组国家形成了5国集团（G-5），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到7国集团（G-7），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8国集团（G-8）。为了抵抗这些发达国家构成的集团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1964年成立了77国集团（G-77），随后其中一组国家，也就是24国集团（G-24）在1971年成立。1999年，7国集团（G-7）邀请一些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加入，成立了新的20国集团（G-20）。

这些集团大多数定期召开会议，并就各国政府和各种多边机构应该如何行动来处理一系列问题（比如

说2007年的金融骚乱）发表声明。此外，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民间社会、商界、劳工和宗教界在环境保护、财产权利、工人权益、减少贫困、金融稳定和促进政府的民主和透明度等方面的利益代表。其中的许多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有效地主张了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但是很难说其代表了世界整体利益。

问题将会日趋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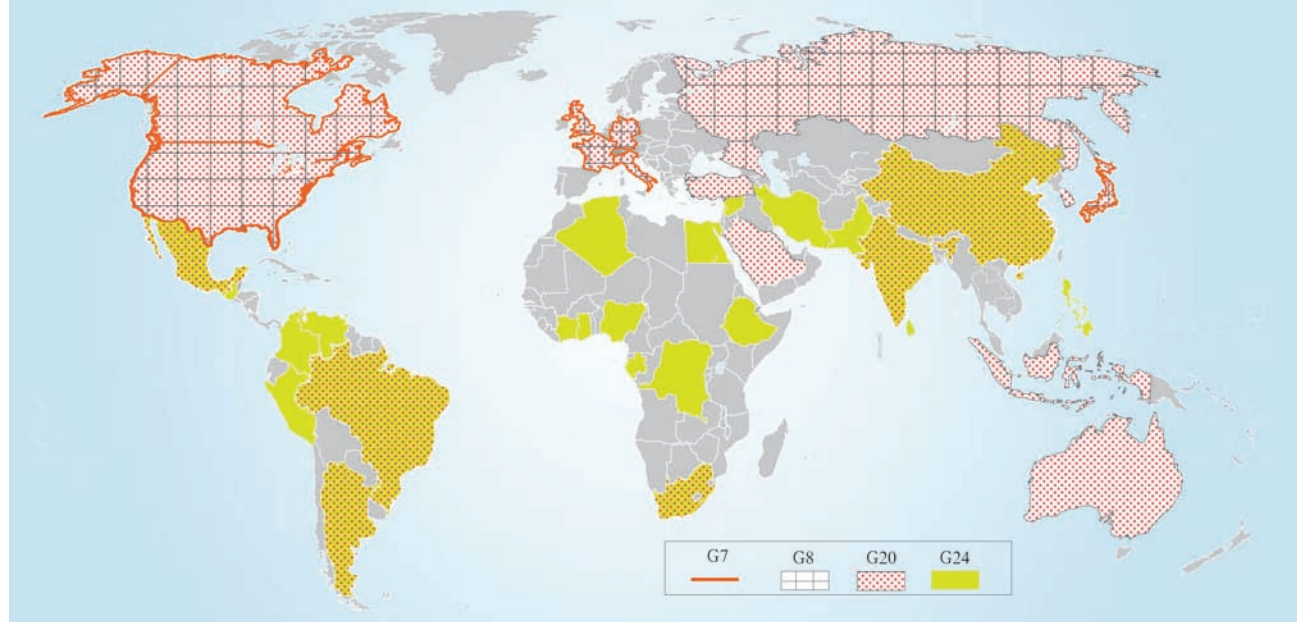
在全球治理中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日趋恶化，并将破坏全球化的进程。正如历史学家Harold James (2001)所说的那样，历史反复重演着这样的场景：国际商业与国际金融蓬勃发展并产生了爆发式的增长和发展，而仅仅是由于大众的强烈反应就会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那些相信全球化会带来利益的人们如果能和那些担心他们的利益会因联系日益紧密而被侵蚀的人们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建立伙伴关系的话，更有可能占上风。

考虑到继续存在的人口增长、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全球卫生健康危险的效应，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恶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的一代人将会看到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和具有挑战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消化庞大的人口增长。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在达到人口数量稳定之前，世界人口将增加一半，即从2000年的60亿人口增加到2050年的90亿人口（联合国，2005；美国人口普查局）。近些年，

相应集团中的国家都是哪些？

多年来，不同的国家集团扮演着全球经济非正式监督员的角色。



许多关于人口结构趋势的讨论，都在关注老龄人口无情地增多以及这将对税收负担、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提供产生的影响。

对发展前景的压力预期尤其巨大。所有额外增长的30亿人口将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国家领导人公认的最重要的千年发展目标（MDG）是，从1990年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该目标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即使是那些落后区域也至少要在个人平均收入上实现增长。要想在未来几十年通过改革使这一进程持续下去，需要富国和穷国、多边机构、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并进行合作。

“那种认为目前对国际关系的监管能够满足21世纪需求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这些严酷的人口现状加剧了关于全球化是带来收益还是成本这个观点的分歧，也使得与以市场为导向理念的传播密切关联的经济全球化力量产生赢家还是输家这一观点进一步两极化。对于人类所面对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是否真正带来了广泛共享的利益并减少了全球贫困的怀疑面临着这样一种风险：它会针对先前的全球一体化的整个进程而再次作出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广泛加剧，并且在前几年就有征兆。

能源。另一个关键和日益增长的全球挑战是能源的供应。举个例子，当前有20亿人不能用上电。加上到2050年世界还将增加30亿人，将会有50亿潜在的新消费者，超过现在用电人数的一亿还多。即使撇开满足相关现代运输工具（更多依赖于使用电力的混合动力汽车）、减少污染和尽量缩小由于人们活动而导致气候变化的工作量不提，单就电力部门而言，满足这个新增需求的工作量就让人生畏。即使不考虑更换和改造现有的电力生产能力或者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单就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新建发电和配电所需要的投资规模已经是非常巨大了。

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能力，是不能迎接未来的能源挑战。需要有一个全球能源市场，并要有代表不同派别的全球机构来监控这个市场。虽然如此，由于无论是在石油、天然气、生物能、核能或者替代性能源部门的大多数投资是由私人公司或准国有企业管理的，其所代表的私人部门和国家利益要比全球公共利益充分得多。

在一个预期可靠的、长期的、大量的投资对于环境和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投资的盈利性有着很强的溢

出效应的领域，却没有一个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也没有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私人 and 公共实体部门能够衡量其他人的行为对自己行动影响的重要性，并能够决定自己的行动，从而从长期的视角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单单依靠市场来运作。

医疗卫生。外溢或扩散效应对于全球健康的重要性更是不证自明的。对全球健康采取零敲碎打的机构性方法令人担忧。当然，慈善家和专项资金为消灭疾病提供额外的资源是令人可喜的发展。然而，捐助人资助的项目计划的繁荣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其责任性。此外，这些努力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可能只追求消除具体的疾病，而不是解决威胁全球健康的根源——贫困问题、制度缺陷，进而对公共卫生保健体系的投资不足，尤其在发展中国家（Waldman, 2007）。

最重要的全球公共健康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以经费不足而著名，没有能力去解决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保健系统的投资问题。世界银行能够部分地解决这种资金的匮乏而且也这样做了，但是它对医疗卫生的贷款是单独进行的，并没有和WHO进行正式协调。很明显，全球医疗卫生治理需要实行跨领域、跨部门、跨机构的方法。

怎么办？

加强全球互动的治理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理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新现有的多边机构，以及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构。

那种认为目前对国际关系的监管能够满足21世纪需求的想法是不可能的。部长级机构，例如，发展委员会、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理事会和世界卫生大会在它们所指导的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每个组织所代表的是这些组织具体使命的利益。在上述的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正式首脑组织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取得合法的全球领导权地位。

最近，备受关注的国际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为的是更加有效率和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如果这些改革真正导致绩效的改进，那么必须要找到一种手段，从而能够将这些机构部门的关注对象整合成一个全面的框架，用以处理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在全球体系的顶端，考虑需要一个新的治理机制。设计这样一个机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免不了争议。目前只能大致地简单勾勒其轮廓。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在改革使各国最高层的或部长级的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的程序，以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构造全球体系的责任更多的是在作为独立个体的各国政府身上而不是国际机构。这些

机构的成员组织受到国家主管当局、财政部长、能源部长、卫生部长和发展部长及其他部门的指导。直到这些主管部门相互作用反映了在金融、贫困、健康、安全等问题的相互关系；直到反映了在新世纪扩大的和全球化世界的真实性，这些机构改革的成就才能显现出来。进一步说，如果不扩大首脑的成员和调动他们履行使命的积极性，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就不能取得广泛圆满的成功。

“所需要的是向着一个经过改革的、具有新的治理机制的全球体系过渡，这个体系能够通过一个有凝聚力的途径调动各种能量和资源。”

最高层次的公共职责是只向国家首脑投资。建立在最高层次公共职责之上的领导关系对于向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战略上的指导，以便有效地应对多部门性质的全球威胁非常必要。因为在现有的首脑分组中，只有真正强大的集团——8国集团首脑才构成了除了富裕的工业国，这些首脑主要来自北大西洋，所以在现有首脑分组中存在着“民主赤字”。结果是国际体系的顶端出现空白。为了使国际机构在一个新的结构中齐心协力去解决我们时代紧迫的问题，非常关键的是，扩大首脑成员，将其他主要区域和代表重要文化的国家作为首脑成员中平等的一员吸纳进来。

第二方面是革新多边机构体系。比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部分机构，被认为很有效率，但是缺乏政治合法性；其他一些机构，比如说联合国则被认为恰恰相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但缺乏效率。

在过去的两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就此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改革议程——如果该议程得以完全和大胆实施——就能对就其政治上合法性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这个议程与治理相关的主要部分是把IMF的影响更多地转移到那些充满活力和快速发展的地区，移出以前占据优势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而减弱，并以更公开，更透明的程序选择自己的管理层。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已修订了其条件准则，在处理与非常依赖于IMF的成员国关系时，减少指令性和强制性，而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

与此相似，在2004年联合国开始努力加强如Florini和Pascual(2007)所宣称的“一个基本上不太稳固机构基础。”这些改革包括扩大安理会，扎实的内部管理改革，采纳更广泛的具体建议，这都是为了使得联合国系

统更加协调一致。随着IMF的改革，依然存在的主要挑战是扩大政治支持，这是实现这些改革措施所必须的。

第三个方面是要产生一个使国际机构全面同全球挑战联系在一起的统治权。对于一个新的由国家元首组成的全球指导委员会，其首要任务就是产生新的统治权。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用综合的、多部门的方法去和全球贫困化作斗争，将关于性别平等、普及教育、卫生健康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整合起来。2008年，为发展筹资的首脑会议将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这给世界领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加强全球努力，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为协调各主要机构、组织和参与者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机构自身的帮助下，一个经改革和扩大的首脑分组能够监督、评价和指导行动议程的实施，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步伐。

今天支离破碎的国际体系是由多边机构、组织和有着身负专门使命的参与者构成的。所需要的是向着一个经过改革的、具有新的治理机制的全球体系过渡，这个体系能够通过一个有凝聚力的途径调动各种能量和资源，以便在这个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时代，有效地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最近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新领导人的选举；8国集团其他一些国家中即将进行的选举，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机构新首脑的选拔，共同带来了一个推动治理议程前进的机会，以创造一个与解决那些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相对应的全球体系。

James Boughton, IMF 历史学家兼政策发展与审查部副主任。Colin Bradford, Jr.,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问题兼职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Florini, Anne, and Carlos Pascual, 2007, "United Nations Reform,"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Breaking the Stalemate*, ed. by Colin Bradford, Jr., and Johannes Lin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p. 60-73.

James, Harold, 2001,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2004,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accessed at www.un.org/secureworld.

_____,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ccessed at http://library.imf.org/unworldpop/DISK_NAVIGATION.HTM.

U.S.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accessed at www.census.gov/ipc/www/idb/worldpopinfo.html.

Waldman, Ronald, 2007,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Breaking the Stalemate*, ed. by Colin Bradford, Jr., and Johannes Lin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p. 100-07.



由于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而发生在英国诺森罗克银行的挤兑。

次级债：一次危机的触痕

Randall Dodd

在去年的夏天，美国严重违约的次级抵押贷款的适度增长使得美国问题贷款又增加了340亿美元，从而竟使得高达57万亿市值的美国金融系统陷入困境，以至于随后发生了全球的金融骚乱。何以至于如此？如果说是因为放松管制而不是欺诈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次级抵押贷款中的承保能够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在2006年的第二季度到2007年的第二季度之间，严重违法贷款的比例从6%上升到9%。但是，这种情况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任何预期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所造成的损失了。

这种状况之所以发生，答案就在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结构的演变。在过去的70年里，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当地储蓄机构发放贷款

为主的市場转变为以华尔街主要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中心的市场，这些银行和公司借助信用衍生产品和经抵押的债务的方式，采用最新的金融工程学来重新包装抵押贷款使其证券化。今天的抵押贷款市场运行的关键取决于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将债务划分成不同的风险环节，并把这些环节分别出售，其中风险最高的环节被卖给那些追求高收益并有时采用高杠杆比例运作的买家，比如说对冲基金。

了解美国抵押贷款市场是如何变化的，并摸清市场的衰弱之处，揭示市场结构的缺陷并找出其破坏性穿越国界扩散到其他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原因，需要一个架构，以便对美国抵押市场作一巡视。

抵押市场的动荡与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一旦崩溃可能带来的坏账一样多。

市场是如何演变的

在1938年以前，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主要是由受到管制的储蓄机构所构成，比如银行和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利用其存款来为住房贷款融资。这些贷款的贷方是贷款的首次发行者，因为他们要保持其投资组合、持有债务风险、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和来自于用短期负债（存款）为长期资产融资的流动性风险。

“经过一段时间，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经营模式逐渐趋同，并且它们一起为美国抵押债券提供大量的融资。”

为了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和让新的资本进入这些市场，1938年，作为罗斯福总统新政策的一部分，政府成立了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Fannie Mae）。这是一个政府拥有的企业，其目标是创造一个抵押贷款二级市场。Fannie Mae从这些贷款的首次发放者的手中购买这些抵押凭证，并将现金收益返回给这些机构。通过直接购买这些抵押凭证并作为一个投资组合持有它们，Fannie Mae随之拥有了相应的债务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是Fannie Mae和那些储蓄机构相比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去处理市场和流动性风险，这是因为其借款期限较长。Fannie Mae也能够更好地管理债务（或偿还款项）的风险，原因是它持有分散在全国范围内的抵押凭证组合，即使是最大的银行当时也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由于对州际银行的管制限制。Fannie Mae可以只购买符合一定承保标准的抵押凭证。这些放贷标准今天一般被定义为“符合标准”的贷款，和“优质”抵押凭证是一个意思。

Fannie Mae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截至20世纪60年代，Fannie Mae借来为其购买抵押凭证提供资金的款项，已构成了美国政府自有债务的很大一部分。在1968年，约翰逊当局对政府资助的抵押贷款市场进行了重新整合，将Fannie Mae的活动从联邦政府的业务预算里面剥离出来。在这次整合中，成立了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该协会通过退伍军人和其他联邦住房等计划，来管理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该协会还将其他的活动私有化，这些活动也要由联邦特许。私人持有的企业——官方称为Fannie Mae——还保留了部分为低收入家庭住房提供公共贷款的责任。在1970年，Ginnie Mae开发了抵押支持债券，它将市场风险转移到投资者一方，还能够消除联邦预算中相

当部分的债务，这些债务是过去为政府住房计划融资而产生的。单纯的抵押支持债券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将类似的债券放入到一篮子里，并且将这些证券售出，购买证券的人拥有从这个篮子里取得按揭证券报酬的权利。这些收益直接付给证券持有者。

联邦国民抵押公司（俗称Freddie Mac）创立于1970年，同样也提供传统抵押债券证券化服务，和刚刚私有化的Fannie Mae公司相竞争。经过一段时间，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经营模式逐渐趋同，并且它们一起为美国抵押债券提供大量的融资，二者都通过购买和持有符合标准的抵押凭证，并且将同量的房屋贷款转换为抵押支持的证券。

这些证券被机构投资者、富有的个人和储蓄机构购买。这种证券化的过程扩散了市场风险，给储蓄机构提供了更具流动性的优质贷款资产，更深地为抵押贷款市场发掘出资本来源。

抵押支持证券不仅使市场风险从抵押贷款的最初发行者如银行等的资产负债表里转移出来，也转移了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风险。它为抵押放贷提供了长期资金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流动性风险。因为是Fannie Mae和Freddie Mac提供的担保，所以大部分信贷风险大多停留在两大贷款巨头手里，它们的规模和经营多样化使它们能够控制这些风险。

证券化涉及将一篮子抵押债务蓄积在一个特殊目的的工具中，这简直就像一个在只征收离岸税的天堂国度里注册的公司。这个公司发行股票，这种股票代表按揭债券的求索权。对于一篮子抵押债券，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将按揭证券的报酬直接付给证券持有者，不过更复杂的结构是将报酬分给较高和较低风险的环节。

证券化使贷款的最初发放者得以从他们的承销行为中获取收入，由于他们卖掉了其发行的贷款凭证而无须暴露在信用、市场或流动性风险中。如果他们愿意，贷款的最初发放者可以通过购买这种证券，重新购回这种市场风险。投资者得到了更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的按揭贷款资产，并且按揭贷款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更多的筹资渠道。按揭贷款服务商能够赚取有利的费用和利息收入。抵押担保证券的发行者赚取承销费用，Fannie Mae和Freddie Mac这两个政府支持的企业从它们证券化的发行中赚取了相应的担保费用。

私有标签的证券

以政府支持的企业作为中心的市场结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吸引其他主要的金融机构参与竞争。由于几年前在遵守新的关于衍生产品的会计规则方面的严重错误，在政府管理Fannie Mae和Freddie Mac两

个公司以后，华尔街的主要企业越来越积极地进入到抵押支持的债券的发行中来。根据 Inside Mortgage Finance 的数据，在 2003 年，政府资助的企业在抵押支持的和资产支持的证券的发行中占有 76% 的份额；华尔街主要公司发行的私有标签的证券占据其余的 24%。到 2006 年中期，政府支持企业的份额下降到 43%，与此相对应，私有标签的证券占据了 57%。在这些私有标签证券发行者中，有些是非常出名的公司，比如富国银行、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公司、摩根大通、高盛、美洲银行和几个主要高风险次级债借入者的贷方，比如说 Indymac、WAMU 和 Countrywide 等。

伴随着市场份额的根本的、迅速的转变，承销标准也出现了相似的改变。私有标签证券份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高风险的次级债和“Alt-A”按揭贷款初始化和证券化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两个公司依然是按揭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这种方式虽然使得比次级债的客户信誉更高的借款客户面临的风险比优质借款客户更高（见表）。

次级债的兴起和证券化的发展导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以政府支持的企业为中心的市场中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怎样销售这些低等级债券？优质抵押担保证券的主要购买者是机构投资者，不过他们的投资规则和指导原则也严格制约了他们购买低于投资等级的证券。在 1.1 万亿美元的次级债中只有一小部分，也就是被证券化为抵押担保证券的 6850 亿美元债务能够卖给不同的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根本不是整个次级债券。

发现新的投资者

转移次级抵押债务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将风险细分。在一篮子抵押债务中创造出低风险投资等级部分，以及高风险（低级别）的部分。为了达到这点，华尔街使用了为债务提供抵押的方法，它是现已停业的投资公司 Drexel Burnham Lambert 于 1987 年创建的，以作为

增长迅速

低于投资等级的抵押担保证券的发行在 2003 年到 2006 年之间迅速膨胀。

(10 亿美元；占总量的百分比)

类型	2003 年	2006 年 1—6 月
优质	57.6 (52)	67.2 (26)
次级	37.4 (34)	114.3 (44)
Alt-A	15.8 (14)	76.5 (30)
总发行量	110.8	258.0

资料来源：Inside Mortgage Finance。

为杠杆收购垃圾债券融资的一部分。

次级抵押债务被纳入了获得抵押的债务篮子中。其中，证券化的对一篮子抵押债务收益的权利被分割成不同的“档次”，或者不同的风险级别。就像第一担保抵押一样，获得抵押的债务支付本金和利息。在一个分为三个档次的例子中，最高一档是风险最低的，这一

“转移次级抵押债务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将风险细分。”

档次拥有从一篮子抵押贷款获得收益的第一求索权。第一档次有着最高的信用评级，有时甚至能够获得 AAA 级的评级，因而可以获得较低的利率。在第一档次的权利得到满足后，中间这一档次或者表格夹层中的档次才可以得到自己的报酬。表格夹层代表着更大的风险并且有着投资等级较低的信用评级和较高的回报率。最底下的档次，或称为权益的档次，只有在第二档次和夹层档次得到完全支付后才能获得报酬。权益档次是在一篮子债券里最先遭受损失的部分，具有很高的风险，通常不予评级。它也提供了最高的回报率，因为风险的存在。每一个档次的证券被分别卖出，并且能够在次级市场上交易，因此价格可以反应每一个层面的风险。

在有抵押的债务中，将近 80% 的次级债能够作为较高档次的符合投资级别的资产再次卖给机构投资者和其他人。对冲基金、拥有交易场所的华尔街公司和追逐高收益的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则认为较低档次的更有吸引力。

普惠评级公司在 2005 年警告说，“对冲基金在信贷市场上迅速成为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是“需要有合理的关注，这些基金最终有可能会无意中加剧市场风险。”这是因为对冲基金大部分投资于高风险投机行为上，而不是透明的实体——它们的资产、负债和交易活动不会公开披露——有时它们利用较高的杠杆率，用衍生工具或者借入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其他的投资和监管者不太了解对冲基金的活动，然而，正像普惠评级公司指出的那样，因为它们的杠杆率，它们“对于全球信贷市场的影响远远大于能够标明的受管理的资产。

媒体报导表明，典型的对冲基金在购买高回报档次时使用的杠杆比例是 500%。这就意味着用借入资本投资于 6 亿美元的股票或次级有抵押债务的夹层档次时，1 亿美元的资本将增加到 5 亿美元。如果这些次级债占据整个债务的 20%，其他 80% 作为高投资等级的债务销售给机构投资者，那么 1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资本

就能使最初发行者和私有标签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商通过次级抵押市场调动30亿美元——24亿美元为投资级的证券，6亿美元作为高收益的垃圾证券。

市场争夺

不像公开交易的证券和远期契约，这些有抵押的债务和信贷衍生品并不在交易所交易。它们是在场外(OTC)市场上交易的。交易所对每一个售出和交易行为公开调停；在OTC市场上，交易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互动的行为，交易的价格和数量并不公开。价格发现的过程不是透明的，并且没有市场监管，以辨认谁处于强势或弱势位置。此外，不像在交易所里，这些OTC市场没有指定的或其他的机构化的市场专家和交易者来确保流动性。因此，当主要事件使得价格震荡时，经销商不再担当市场庄家，交易就会停止。

当去年8月份紧缩冲击时就在利用高杠杆比率运作的投资者，比如说对冲基金需要调整其仓位或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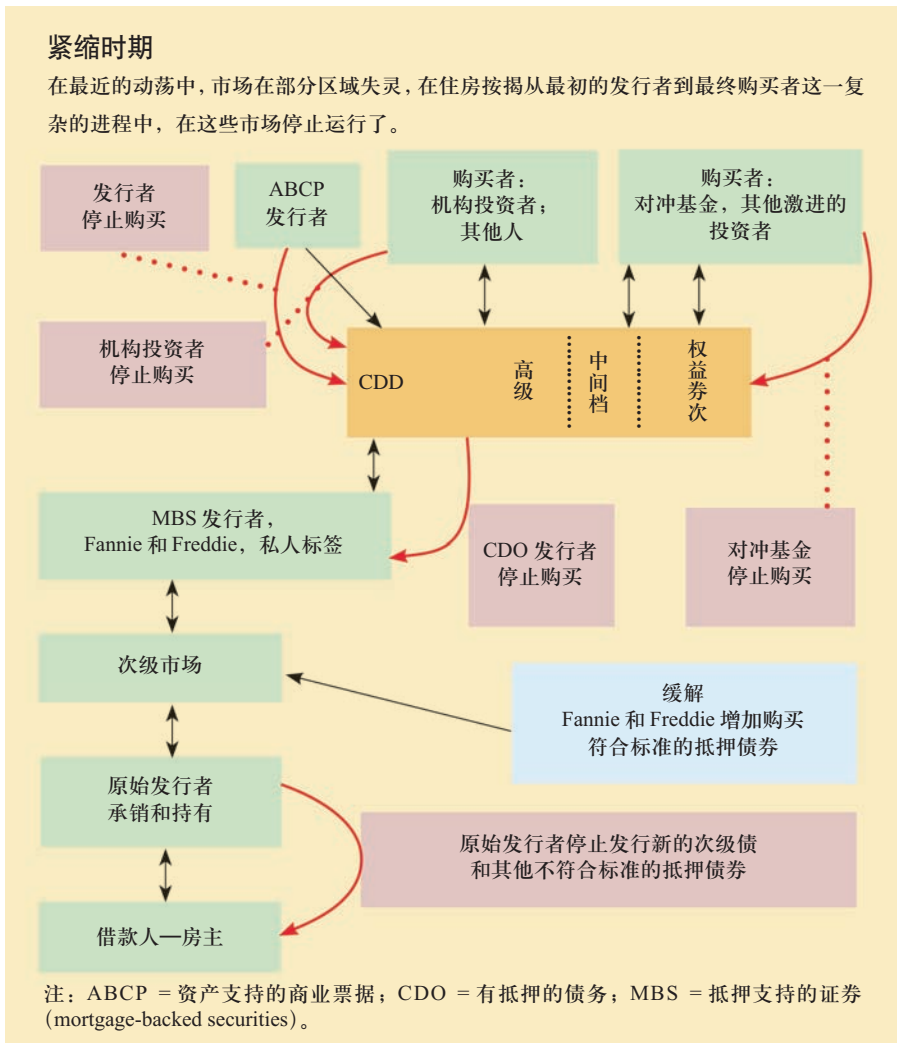
售损失的部分之时，次级抵押支持证券的市场变得缺乏流动性(见图)。这使剩下的对冲资金陷入不利的处境，与此同时他们面临着来自主要经纪人的补充保证金的要求(对冲基金根据它们的资产价值来借款，而当这些价值降低，对冲基金需要拿出新的资本或者卖掉资产来偿还贷款。)。这种情况最终被恶化了，这是因为，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基准，也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不同风险档的价值。

结果是对冲基金停止交易，有抵押的债务市场和相关信贷衍生品市场基本上限入停滞。有抵押的债务的发行者不能够卖出其现有证券并停止安排新的发行。

随着二级市场没有了购买者，次级债的最初发行者不能够卖出他们创造的贷款。这给许多发行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大部分被稀释分布在不规范的财务公司上。紧跟着，银行界撤回了对这些发行者的投资，这些发行者不能够再继续持有他们曾经制造出的抵押债券。他们立即停止了发行新的贷款，至少是新的次级贷款，其中的一部分申请破产保护。因此，想购买

房子的人和想融资的房屋所有者便不能获得不符合标准的抵押贷款，这阻碍了那些希望通过再融资来避免错误从而形成偿债问题的人。这时房地产业的需求枯竭了。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停止购买高档次的次级债；在这些相关资产属于次级债的投资等级被揭示后，商业票据——企业的借条的买主停止购买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尽管这些票据通常是处于资信等级序列的顶部。高的信贷等级曾经一度满足了投资者对信用风险的关注，但是一旦股票和中间档的价格崩溃，就会导致投资者对投资等级风险环节进行再评估。主要的银行和经纪—交易商对管路和结构投资载体(SIVs)授予最高的有担保的信贷额度，同时也是这些商业票据发放者的他们，将会兑现这些额度。银行使用这些管路和SIVs使得次级资产剥离出他们的账表，并且避开资本管制要求。但突然间，这些资产必须回到华尔街主要银行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这需要他们



为管路获得另外的资金，并采取资本管理来解决对管路的贷款——这进一步增加了对金融系统的信贷需求，而此时信贷是枯竭的。

对冲基金和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也在市场中中断的跨境扩散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当高风险档次的价格暴跌和投资者不能卖出他们损失的头寸时，其他资产——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不明朗收益的资产，比如说新兴市场的股票——将被出售用来满足保证金需求和弥补损失。股票市场的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下跌，尽管大多数很快反弹，但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货币价值同样下跌。

缺乏透明度的场外交易市场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投资者突然转化为风险厌恶者，他们不知道谁暴露或者谁没有遭受次级债的风险。高收益的按揭证券吸引了许多非美国的购买者。几家投资于美国次级债市场的德国银行要求进行法规干预，诺森罗克银行——一家英联邦银行的存款者也开始取出其存款。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市场的失灵也冲击了加拿大，因为在关键时期出现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有担保的贷款额度所支持的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管路被证明是不合格的背书。

查找中断的原因

几个缺点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从而使得仅占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一小部分，仅3%的不良资产导致57亿美元的资产整体跳水。美国的金融系统陷入混乱，并导致全球的颤动。

- 首先这个市场在结合点上出了问题，在这个结合点上次级债务的最高风险档掌握在高杠杆比率运作的投资者手中。对冲基金没有资本准备金要求（在这方面，它们不受管制），并且这种高杠杆比率的行业惯例也使投资者能够利用超额风险。利用一定比例风险的投资资本会从有限的风险中获得稳健的收益，并能保有一个在损失和破产之间的缓冲区。超出稳健限度的风险行为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也是市场结构的薄弱点。

- 市场的中断也是由于不受管制和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是次级有抵押的债务和信贷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上流动性的提供者。一旦这些市场偿付危机出现，它们

将迅速转变成流动性紧缺，交易从根本上停止。

- 不受管制的和资本不足的抵押贷款发行者也是促成这次紧缩的原因之一。最初发行者，比如对冲基金，用很少的资本和短期融资去投资于他们制造的而且只希望短暂持有的次级债。一旦他们不能够将这些抵押贷款卖给那些把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的公司，这些不受管制的发行者就会被强制出局。

- 缺乏场外交易市场透明度恶化了这种局面。缺乏识别次级债风险的性质和位置的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的评估瞬时即变。一旦对次级债市场的风险过于悲观、恐慌和困惑，投资者就会变得十分惊慌，并且过度高估风险，即使对于那些高等级、优质投资档次的证券来说也是如此。

- 场外交易市场遭受到流动性失灵的损害。面对价格的更大波动，这些市场不是迅速反弹恢复，而是随着交易对象变得不可信任和买家的退出而停止了交易。

市场稳定的开始

尽管重新恢复住房融资的稳定是具体的补救措施，但是次债危机揭示了众多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行业标准的实施效率，任何跟OTC衍生工具和抵押品（保证金）使用相关的各种现有的规定和对对冲基金的借贷标准都需要重新评估。

第二，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要求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实施报告制度这一举动对它们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对衍生工具和证券的影响——例如有抵押的债务。

第三，扩大措施——比如说现有的在证券交易所和国库券的场外市场——推动经销商担任市场庄家是需要考虑的。否则的话，在重要的OTC市场要怎么做才能有助于阻止流动性紧缺？

第四，探索将抵押贷款的首发者置于一个审慎监管的架构和联邦政府管理下是非常有益的，联邦政府要像金融机构一样对待这些公司，这是毋庸置疑的。

Randall Dodd, 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高级金融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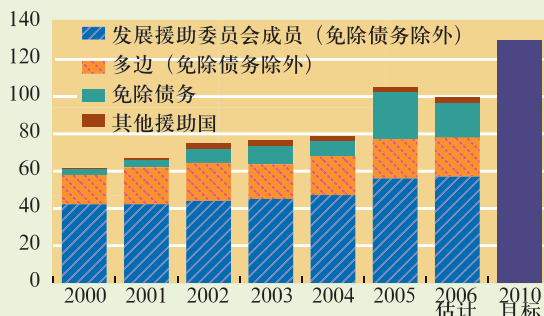
“就在利用高杠杆比率运作的投资者，比如说对冲基金需要调整它的仓位或者出售损失的部分之时，次级抵押支持证券的市场变得缺乏流动性。”

释义 改变 援助面貌

尽管援助国承诺按照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格兰尼格尔宣言的要求,按比例增加援助,然而结果却是不同的。2006年实际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约5%,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据OECD估计,2007年还将有略微下降。而且,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在2005年缓慢升至0.33%后,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0.3%,仍旧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7%的目标值。

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实际的官方发展援助正在下降,离目标值仍有一段距离。

(全部官方发展援助,10亿美元,2004年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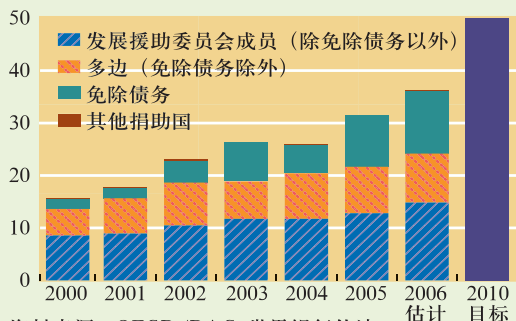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 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世界银行估计。

注: 其他捐助国包括向OECD/DAC报告的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 本领域并不包括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这样的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援助提供国。

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已经提供的援助中, 2005—2006年期间, 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1/5被认定为免除债务, 由巴黎俱乐部与伊拉克和尼日利亚谈判解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免除债务约占官方发展援助的1/3, 从而增加了另外的问题, 即随着免除债务的消失, 援助国是否能够实现和维持将援助增加一倍的承诺。

而且, 尽管在援助流入情况较好国家, 短期的援助预期有改善的信号, 然而其模式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13个援助流入相对较大的样本国家, 预算中援助部分的易流失性在1993—1999年和2000—2005年期间有所下降, 但几乎1/3的援助仍不能及时到位。即使在一些援助流入较好的国家, 加纳和乌干达可预测的预算援助下降, 而坦桑尼亚则停滞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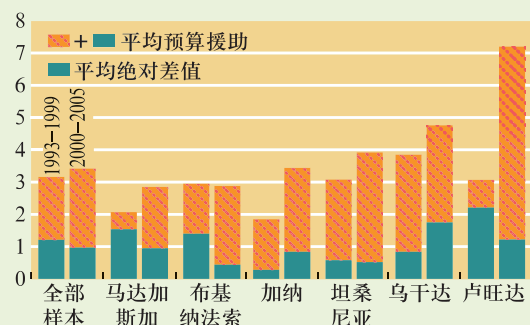
在非洲, 免除债务是近期援助增加最多的部分……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 10亿美元, 2004年的价格)



资料来源: OECD/DAC; 世界银行估计。

注: 其他捐助方包括向OECD/DAC报告的非DAC捐助方。

……只有约65%的援助按期到位。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Oya Celasun 和 Jan Walliser, “援助的可预测性和非循环性: 是否变化无常的援助国破坏了经济发展?”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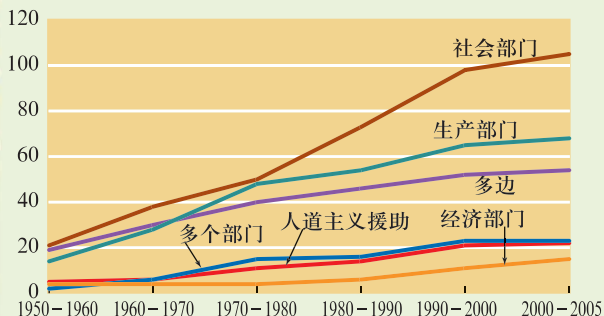
注: 差值是IMF政府项目中预算援助计划和实际支出的差值。

在更长一段时期，发展领域援助途径的数量有所增加——从1950—1960年期间的65个增加到2000—2005年期间的287个。许多新的援助国公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加速参与到援助领域，特别是私营组织已迅速扩大了其活动。虽然统计数据还非常不完整，但据估计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慈善捐款已高达60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美国——自1990年以来，其贡献已增长4倍*。

但援助国的增多也同样带来了挑战，包括援助流动的分散，这一点通过每年更多数量、更小规模的捐助活动而得以证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每年由几个并列的实施单位举办的援助资助活动达1000多次，并每年准备多达2400次的进展报告。

援助国日益增多……

(国际援助国数量)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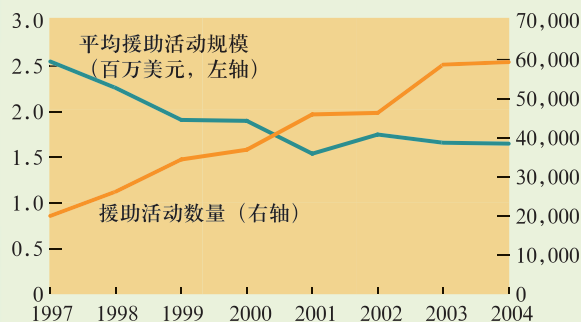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DAC 债权人报告系统 (CRS) 数据库；世界银行估计。

¹包括公开、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经费和项目。

Homi Kharas, “援助的新现实” (2007)。

……导致援助流动的分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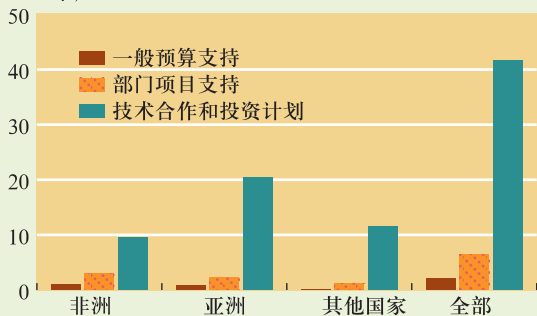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DAC CRS数据库，世界银行评估，援助结构，IDA讨论论文第15页（华盛顿，国际发展联合会，2007年）。

另外的挑战是援助的用途，包括“全球项目”或垂直经费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加。如果这些经费用途很窄，并只使用独立的融资机制，在受援方之间和部门内部优先权中存在调整风险，并可能在经费的规模和内部吸纳能力之间存在不能匹配的现象。关于援助用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援助方仍然不能合理分配关于部门项目支援和一般预算支持的计划和技术合作。

在卢旺达，尽管疟疾是发病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但用于抗击疟疾的援助经费只有用于对抗艾滋病援助经费的1/3。而且，75%的援助支持直接流向非政府组织，或由援助方通过自己的项目直接接受管理，极大限制了政府将官方发展援助用于优先项目的能力。

……援助用途的重要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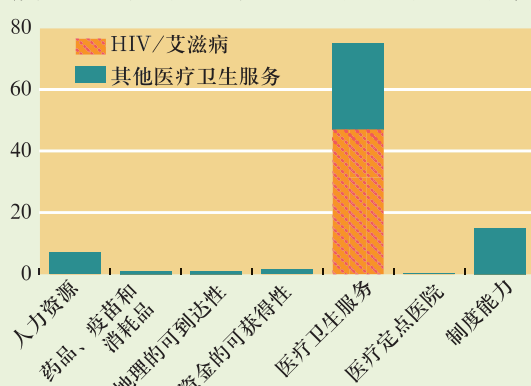
(由种类所确定的ODA义务，DAC国家，10亿美元，2005年)



资料来源：OECD/DAC, CRS数据库。

……增加了受援方对优先项目选择不当的担忧。

(在卢旺达根据战略目标实施的援助资金分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卢旺达，基于国家的按比例增长：进展评估和行动议程（华盛顿，世界银行，2007年）。

注：对抗疟疾经费包括疫苗接种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

由世界银行的Stefano Curto提供。



全球贸易 管制

在过去50年支撑世界贸易的多边体系正面临严重挑战

肯尼亚咖啡采摘者在倒掉桶里的咖啡豆。

Uri Dadush 和 Julia Nielson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被证明是费时的和困难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正在被谈判厅内的不一致和谈判厅外的激烈抗议以及以空前速度成长的优惠贸易安排所困扰，战后时代管制国际贸易的多边规则体系还能够发挥其作用吗？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对于战后较多的贸易框架，多边贸易体系不能够想当然这样。这个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有两个中心问题：不断强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未完成自由化议程的敏感性。由于优惠贸易安排的兴起，前景将更加复杂。如何迎接这些挑战将决定世界贸易是否继续被多边体系规则所管制或者以竞争性贸易集团和不断上升的争吵为特征。

贸易发展的基础

以实际贸易量衡量，多边贸易体系好像已经非常成功。当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包括石油）中的比重超过90%。平均而言，在1990—2005年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贸易增长几

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预期2007年全球贸易额达到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1%。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量的增长几乎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国外企业的国内销售额高于世界出口，并且严重依赖半成品贸易，进一步显示了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贸易一体化的重要性。

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其他技术创新是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但贸易壁垒的减少也起作用。1983—2003年，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实施税率从略微小于30%下降到大约9%（世界银行，2007）。这种自由化的2/3单方面发生，大约1/4通过多边协议进行。

贸易体系包含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中，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贸易体系通过5个重要方面对这种自由化起到基础作用。

第一，确保在环境变化时锁定改善，防止恶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已经导致一些进口国家要求提高关税，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却不允许抬高关税。锁定的事情：如果日本在1955年限制大米关税（限制关税，即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国承诺的关税

税率,很难提高),那么现在的大米关税将仍然是46%,而不是超过500%。

第二,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 MFN)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原则,它确保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出现的关税削减的贸易新机会对所有参与这个体系的国家都适用,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

第三,由于成员国知道贸易伙伴国运作的相关因素并且还由于示范效应,体系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已经促进了改革。多边谈判集中在限制而不是实施关税(实际上课征于进口商品的关税一般低于限制关税),允许成员国以自己的步伐自由化,当成员国减少实施关税时,它们知道将不会浪费谈判筹码。

第四,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准入原则允许成员国以自由化承诺交换最惠国待遇。2001年,中国的加入是以影响深远的国内改革为基础,并且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像越南、沙特阿拉伯甚至将来俄罗斯的加入已经带来或者期望带来将近2.5亿人到世界贸易的洪流中。

第五,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使小的、贫困国家获得与大的多、有实力的国家一样完成贸易政策的变革。已经解决了超过300个贸易争端,大约1/3是由发展中国家引起的(Messerlin, Zedillo和Nielsen, 2005)。并且大量的争端不会上法庭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协商解决争端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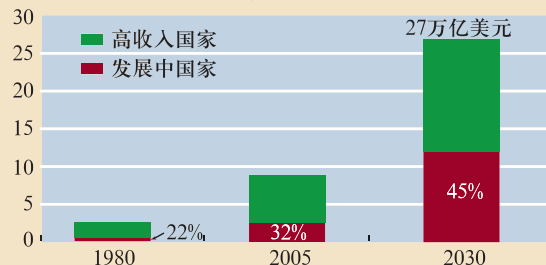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参与者

现在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考虑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占全球贸易额从1982年的22%上升到2005年的32%,并且预期到2030年达到45%(见图1,世界银行,2006)。大约2/3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

图1

主要贸易国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积极角色。
(总出口, 万亿2001年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Linkage模型的模拟。

达成协议。世界贸易组织的力量是基于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其核心职能是为政府彼此协商提供一个论坛。但是现有151个成员国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多数票决策的规则很费时而且非常吃力。随着成员国和包含的预期的增加,这种过去在公开的密室里达成协议的交流变得越来越费力。如果美国和欧盟不能够同其他成员达成协议,那么达成的协议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同心圆的程序:主要参与者和/或小的成员国在关键问题上(这就是熟知的“后台”程序)小同心圆的尝试性协议通过不断妥协或者调整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

关于这个程序包容性的问题被提出,部分是由于最贫困的成员国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中不具有代表性,其他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少数代表覆盖广泛的议程。解决办法就是像那些有头脑的国家为特殊问题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非正式体系——这些国家的领导在后台程序中具有代表性。

分割利益。尽管成员国有代表性的群体非常重要,但世界贸易组织协商程序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构成这个群体的联盟国家的变动性。成员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联合,也可以在另外一个问题持反对态度。这种变动性是认真负责的良好标志。

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的关键是这个事实:成员国之间的多重利益在他们之间的平衡。在其他领域获利的背景下,在另一个领域的次优结果就能被接受。这些替代关系使投票通过成为可能。

但是许多最贫困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可能在体系中看不到利益的平衡。其直接利益可能局限于少数几种产品,这可以从它们出口缺少多样化中反映出来。对于它们,在比较广泛的问题投反对票而在单一问题上投支持票也许是划算的。

甚至有着广泛贸易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感觉不能够从这个体系中获益。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加强国内改革,但是改革需要调整成本,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为提供安全网络而奋斗。其他一些国家不能为从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分割利益所必需的机制而投资。关键上,它们不能够利用新的市场准入。

高成本和低效率的海关、港口和交通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传统上贫困国家主要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服装产业的位置越来越取决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以及稳定的需求。在肯尼亚每劳动小时的成本比中国沿海低10%,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不充分的供应链抵消了这种优势(Werner 国际;世界银行,2007)。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也被薄弱的基础设施所限制。

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担心这个体系损坏其利益。那些从特殊产业中获得单方面利益的国家担心贸易伙伴国的自由化将腐蚀其利益。它们不仅反对自身的自由

化，而且由于调整成本反对其他国家的自由化。

更多的贸易援助。解决这些局限的额外援助——对贸易的援助——将是对任何多边贸易协议的必要补充。荒谬的是，帮助贫穷国家的部分解决方案使它们感觉到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它们可以在比较广阔的发展团体中获得利益，在这个团体中捐赠者支持在发展战略中优先发展最重要部门的贸易。如果贸易需求被较好的处理，并且没有同已经存在的发展优先项目竞争的资源，捐赠者将需要履行增加援助的所有承诺。

差异。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有影响力的联盟并且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扮演了一个比较活跃的角色。例如巴西和印度领导的20国集团主张对发达国家的农业进行改革。

这个激进行动同时发生在发展决策上，发展是当前谈判的核心。部分由于差异，在多哈发展议程下的谈判，对于“发展回合”的意思是什么展开了争论。共识是发达国家应该减少贸易壁垒，但是有些国家认为发展回合的中心意思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改革，另外一些国家认为发展最好通过增加灵活性而不是改革。大量的争论集中于灵活性应该扩展到何种程度以及针对谁。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授予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对最不发达国家授予额外的灵活性。但是没有进一步根据收入水平区别发展中国家。18个没有划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国家没有享受到额外特殊待遇，这个待遇已经扩展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自我贴标签，其中包括一些高收入国家（新加坡）。这使谈判变得复杂因为发达国家不愿意给予中国特殊待遇，而这个待遇它们可以给予喀麦隆。

发展中国家之间较大差异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小的经济体——它们想要自身的特殊问题得到承认，另一方面来自于发达国家，它们想要限制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却抵制较大的差异性，部分因为尽管它们的利益存在多重性，但它破坏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对于这个超越多哈回合但依然相关的体系，改革可能需要考虑增强谈判方式的速度和灵活性。

未完成的议程

挑战依然存在于谈判议程中。

农业保护。50多年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减少农业保护方面取得了有限进展。在所有领域，农业关税依然比制造业高很多（见图2），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在制造业已经取消，而在农业部门仍然是其特征。根据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富裕国家的纳税人（以补贴形式）和消费者（由于贸易壁垒导致的高价格）一年为支持农业支付了大约2,680亿美元，其中欧盟（1,340亿美元）、日本（370亿美元）和美国（430亿美元）高居榜首。

同时，在发展中国家，73%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收入占GDP的30%—60%，并且在就业方面占更大的比重。但是农业保护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高到损害本国贫困消费者、出口商和其他贫穷国家的利益，而这些国家是其不断增加的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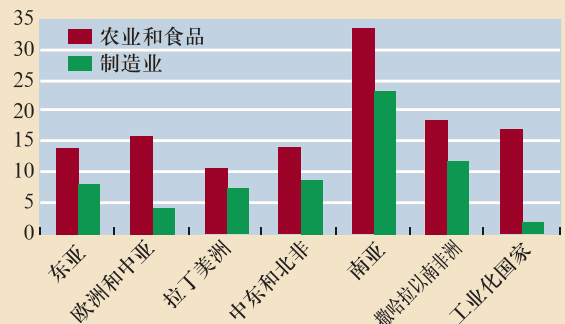
把农业部门纳入与其他部门同样的贸易规则下是对世界贸易组织促进发展能力的一个尝试——这样说是因为多边贸易体系是解决农业补贴的惟一论坛（它不能够基于优惠的基础上减少）。

制造业保护。尽管发达国家依然存在的高关税倾向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获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如服装）部门，在发展中国家保护程度比高收入国家高出4倍有余。发展中国家包含高关税的价格再次被本国消费者、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及参与全球生产链的竞争力被花费较高的投入所破坏），及其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其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1/4）支付。

作为富裕国家在农业方面改革的对应是，发展中国家在近期的谈判中应该准备降低和限制制造业关税。有相当大的余地去做：平均来讲，发展中国家限制性关税比实施关税高2.5倍有余。

服务业保护。制造业更进一步的自由化所获得的收益与服务业自由化所获得的潜在收益相比相形见绌：从服务业的一半保护获得的实际收益的增加比从商品贸易同样的自由化程度获得的实际收益高5倍有余。全球服务业贸易额2.8万亿美元，不足全球贸易额的1/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像金融、交通和通讯这

图2
农业保护
农业贸易壁垒比制造业高很多
(平均关税,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基于普度大学全球贸易分析程序(6.03版)的估计。

样的高质量和低成本的服务在决定竞争优势方面起着决定作用。

但是服务业的市场开放非常复杂，因为新规则或者新制度需要保证自由化能够加强竞争并且保证能够达到公共政策目标——比如全民服务。贸易援助可能需要发展中国家设计新规则并为新制度融资。在多哈回合中，规则性和政治性挑战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重大利益补偿方面也是重要的：提供服务的人口的暂时流动。在贸易和移民机构之间的较大合作将需要认识到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和存在大量年轻人寻找工作的发展中国家双赢结果的潜力。

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在服务业方面的承诺比这个体制已经应用的要少很多，缩小这个差距将成为当前谈判的一个重要目标。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讲，在有限制的服务业方面取得进步是对农业政策改革困难方面的补偿。

纳入新议题的压力。尽管这个议程尚未完成，一些最发达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正在探求反映其经济复杂性的新领域的规则。这些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比如竞争性政策）需要国内制度机构的投资以及在缺乏资源的状态下国家不优先发展的项目的投资。

这个体系在解决像人权、移民、劳动力和有关的环境

问题上的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原因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其他解决这类问题的类似组织机制的缺乏显示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论坛，也是政治意愿问题。

压力也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比以前更加直接作用于人们生活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通常被理解为贸易）。然而，这个体系发现它很难抵制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压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精力将较多花费在解决这些突出的贸易问题上，比如在农业方面的过度保护，而农业是这个体系促进发展的核心。

由于近年来互惠贸易协议（PTAs）的增加，管理这些挑战而变得更加复杂：超过200个互惠贸易协议（PTAs）正在执行，在过去20多年增加了6倍（见专栏）。到2010年，大约有400个互惠贸易协议（PTAs）开始执行。

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是困难的，我们提供超越一般观察、非蓝图式的解决方案。这个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系统，其重要性随着贸易在全球经济活动所占份额的增加而增长。我们必须继续巩固那些已经存在的、到目前为止仍然为全球经济良好服务的基础。多哈回合的成功结束将是关键的，沿着最近的这条线进行协商，多哈回合成功是可能的并且将带来良好的收益。至少，它将表明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有能力使我们所说的未完成的议程重回轨道。

Uri Dadush, 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部主任; Julia Nielson, 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部高级贸易专家。

互惠贸易协议（PTA）的争论

PTA 是否能够提高福利依赖于其设计。尽管深层的贸易协议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将使各方受益并且帮助最惠国自由化，但并不是所有的 PTA 都是高质量的，其中一些是净贸易转移，其他则仅仅是一张纸质协议。这些 PTA 正在创造不同需要的网络，对贫困国家一些小贸易者带来了问题。如果 PTA 打算推进全球生产链，并同时减少限制贸易转移范围的最惠国待遇关税，原来简化的和没有限制的规则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已经存在数个世纪的 PTA 常常反映政治地理或者反映比多边协议可以获得更多和更快自由化的欲望。很少有人对 PTA 就停留在这儿这一观念提出挑战。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有助于使可能的损失最小化。它可以推进透明度的提高，给予学习的机会和帮助减少贸易转移效果。并且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是使农业补贴问题在现实中得以解决的惟一场所，并且还是主要贸易势力管理彼此贸易关系的关键渠道。

参考文献：

- Messlerin, Patrick, Ernesto Zedillo, and Julia Nielson, 2005, Trade for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UN Millennium Task Force on Trade (London: Earthscan for the UN Millennium Project).
- Newfarmer, Richard, ed., 2006, Trade, Doha and Development: A Window into the Issu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 Werner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upplied to authors in 2006.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 , 2004,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5: Trade,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 , 200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7: Managing the Next Wave of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 , 2007, "Aid for Trade: Harnessing the Global Econom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evelopment Committee, World Bank Annual Meetings, 2007.



未来的 金融危机

受到1998年经济危机影响的无家可归的俄罗斯人。

Paolo Mauro 和 Yishay Yafeh

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传染性危机和19世纪90年代个别国家的危机具有相似性？

20世纪90年代的破坏性金融危机，发生于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亚洲和1998年的俄罗斯，并迅速扩散到新兴市场国家，推动产生了改革金融体系的要求。然而，那仅仅是十年前的事。本世纪主要、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于2001年发生在阿根廷，除了其邻邦乌拉圭，几乎没有产生危机溢出或扩散的情况。在最近几年，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在其发布的金融刊物或出版物上的言辞经常强调，全球性风险传播的危险明显下降。

这不是说，投资者们经常忘记风险传播的问题：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包括2006年3—6月新兴市场国家股票的大跌。全球证券价格的下跌开始于中国股票市场在2007年2月和3月的下跌。近期，最让人悲哀的是开始于2007年中期，由美国次级债市场的发展引起的资本市场的动荡。

然而，整体来说，在过去短短的几年里，新兴市场国家享受到充足的流动性、低债券利差、资本的涌入。甚至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

代的扩散性危机不是正常的而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在金融全球化的上一个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世纪，世界经历过几次危机，但本质上不具有传播性。即使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金融大萧条时期，1890年发生在阿根廷的霸菱危机，也没有对超出其国界的其他地方产生多大影响。

是否未来的危机看起来和20世纪90年代或者19世纪90年代相似？是否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是自我独立危机回归的先兆？如果国际溢出性依然保持可能性，在金融领域是否有全球管理迹象？为了探讨这些问题，分析这些历史记录是非常有用的。

两个时代的一个故事

在1870—1913年金融全球化这个时代，有着自由贸易、几乎不受限制的移民、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和现在相似的复杂的金融市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全球化。在那个时期，“新兴经济体”在伦敦市场发行的债券，规模非常巨大（其整体资本额超过英国GDP的一半）；具有充足的流动性（债券利差变动相当大并且每天将情况登报公布）；并且有及时和可靠的信息作支撑（从英国新闻界获得的有关新型经济体的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新闻）。一个在20世纪之交的英国投资者的典型投资组合很可能比他生活在21世纪的曾孙子更加国际分散化，并且包括更广泛的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股票。

这种全球一体化突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后巨大的萧条和二战爆发所打破。国际金融流动复苏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仅仅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金融全球化才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和形式。特别是，对交易新兴市场国家债券的信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布雷迪交易才开始。这些债券重新包装了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被拖欠的银行债务。

尽管在规模和对债券融资的依赖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仍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存在于1870—1913年的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之间，这些不同尤其是与资产价格波动的范围和主权债券利差变动联系在一起。对于过去的代来说，主权债券利差变动是明确的，这是因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以英镑为单位表示的债券的收益率减去英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对于现代来说，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以美元为单位表示的债券的收益率减去美国长期国库券的收益率。然而在1914年前的时期里，债券利差变动遵循着特定国家的轨迹（见图1），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利差变动倾向于一个更大的变动范围（见图2）。当一个人关注不同时代危机的共同趋势时，

会发现这些信息具有相似性。主权债券利率急剧的变动（譬如说，有超过200个基点的变化）通常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个新兴市场国家中，但是在1914年前的那个时期里，这些变动往往被明显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

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变化

如何解释在两个时代之间，观察到的资产价格协同运动在程度上的差异？相关证据（基于对时间的研究和对资产价格数据、宏观经济变量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及时的报纸文章）显示决定资产价格的关键变量是不同的。在一个世纪以前，债券利差变动主要取决于国家区域内的事件，比如说干旱、叛乱、战争，其他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尤其是，政治事件造成的暴乱是债券利率变化的最主要显性因素。与之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特定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和事件，尽管依然相关，对个别国家的债券利差波动解释力受到减弱，与此同时，整体新兴市场国家指数的发展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传染性危机）。

“预测21世纪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很有可能综合着过去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危机的性质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现代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利差的协同变动程度比以往时代更大，这被解释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具有更大程度的相似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经济体趋向于各具特点（如阿根廷主产小麦和毛织品，巴西主产咖啡和橡胶）。现在，它们更加多样化，作为相应的结果，参与更多相似的经济活动，以至于其经济基础比一个世纪前在更大范围内趋向一致。然而，在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相似性并不能完全解释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和危机的扩散。

投资者行为和其投资方式的组织化和承诺化，也是导致在当代资产价格协同变化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给定的国家中，在一个危机开始时遭受的损失会导致大的投资基金（包括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去卖出在（最初）未受影响国家的资产，以维持较为稳定的流动性和风险组合。举例来讲，当开放式共同基金预见未来的赎回在一个国家受到打击之后，它们将通过售出持有的其他国家资产来增持现金。与此相似的是，杠杆投资者，比如银行、尤其是对冲基金，面对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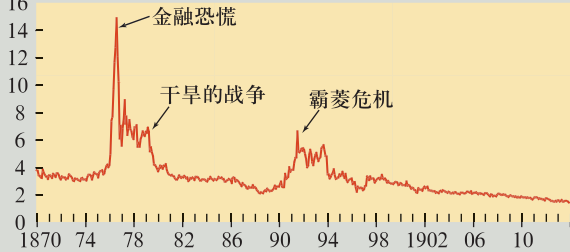
图1

他们自身价值的变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50年间，对应于国家特殊事件，主权债务的利差变化。

阿根廷

(利差, 百分比)



巴西

(利差,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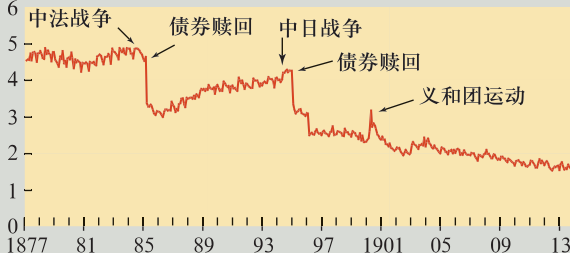
智利

(利差,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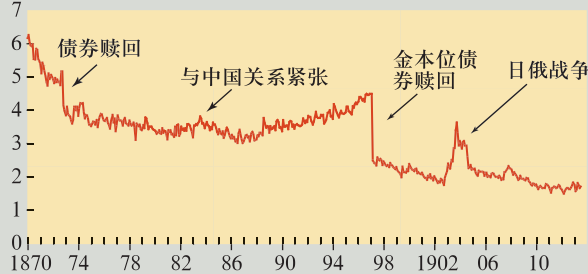
中国

(利差, 百分比)



日本

(利差, 百分比)



俄罗斯

(利差, 百分比)



资料来源: Mauro, Sussman和Yafeh (2006)。

注: 利差变化指的是, 在英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以英镑表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的收益率减去英国长期国债(英国长期债券指的是没有特殊的到期日期和永远支付利息的债券)的收益率。

管规定、内部供应惯例、保证金要求, 导致它们通过售出那些它们所持有的但刚开始没有受到损害资产的方式, 来重新调整其投资组合。恰恰相反, 在过去, 投资者主要是个人进行交易的, 在那时交易技术也比较落后。在危机即将到来的时候, 投资者很有可能通过购买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 来对在某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遇到的麻烦做出反应, 因此他们转移资产而不是将资产整体出售。

阿根廷的奇怪情况

为什么2001年末阿根廷发生的危机几乎没有传播

(只有乌拉圭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阿根廷人将存在乌拉圭银行系统的储蓄取出造成的)? 投资者行为也是理解这个事件的钥匙。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使得众多投资者惊奇, 阿根廷的危机被广泛预料到, 市场参与者有足够的空间机会去调整他们的方向。有关国际共同基金的数据表明在整个2001年, 阿根廷的债券持有率明显下降。经过一段时期, 到12月阿根廷货币发行局制度崩溃, 其储备极低。在一个更加技术的水平上, 在被众多市场参与者追踪的新兴市场国家债券指数上, 阿根廷一次及时的规模缩水, 有可能促进一次有秩序从阿根廷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头寸的转移。

尽管在讨论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时, 有些人认为

危机传播可能会永久消失，但预期这场危机的性质会让人对这种观点有所怀疑。与之相反，在最近几年可以观察到，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活动显著地增加，这种情况是和这种观点相一致的。这种观点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基本面，投资者不能很好地辨别新兴市场国家的状况。

在核心和在外部的麻烦

另外一个决定危机是否传播的因素是和核心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受到危机起源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相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在许多众所周知的在新兴市场国家广泛传播的危机中，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扮演了将最初的冲击转移到周边地区的角色。比如说，受到损失的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危机的渠道。

长期资本管理的溃裂是1998年8月俄罗斯危机向其他新兴经济体扩散的一个关键因素。最近让人悲哀的是，美国次级债市场危机的发展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尽管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这并非是一个全面危机。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及时的流动资金，很可能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传播的可能性。但这些中央银行主要瞄准集中重建国内市场的信心。自金融全球化时代以来，由在核心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提供及

时的流动资金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英格兰银行的及时行动往往能够避免国际危机传播，否则在1890年的霸菱房屋投资的崩溃将会导致危机的传播。

危机扩散的前景展望

在未来，金融危机扩散和全球金融市场协同运动的可能性将会被加强，这是因为日益增多的新的金融工具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新的参与者：

对冲基金在最近几年迅猛发展，其管理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就像我们看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和最近的次债危机，对冲基金的行为往往加强了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然而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价格对于较低风险偏好的消费者降得太低的时候，对冲基金通过“逆向”市场交易有时候也有可能减弱金融危机的激烈程度。

“尽管有些观察者建议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但是注意力很可能将放在增加透明度、数据的提供以及改善现有的审慎规定。”

私募股权基金对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协同运动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作用越来越模糊。私人股权基金是显著的长期投资型基金，所以它的出现可能有利于减轻危机程度和增强稳定性。但如果其一旦转变他们的立场，相反的作用将会产生。进一步说，私募股权基金有时也有着短期投资的视角，这将导致它们同时在几个国家投资于时尚的部门。这将导致资产价格在贯穿数个国家中产生协同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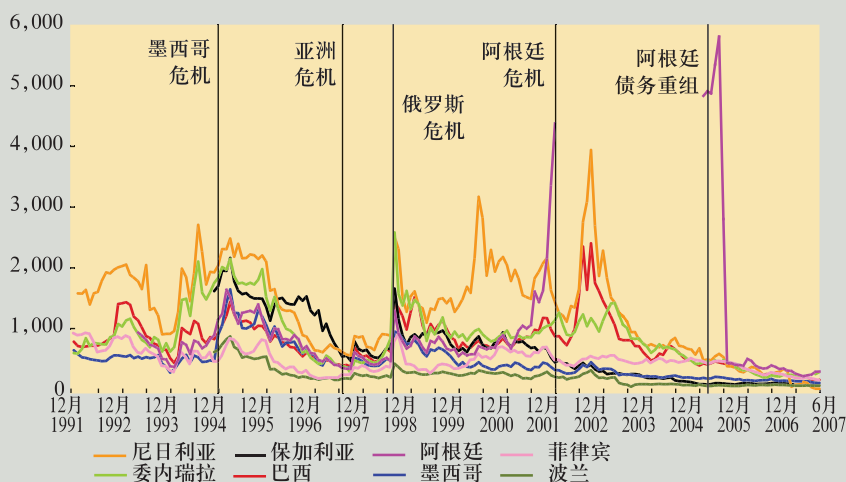
主权财富基金是耀眼的新的兴趣点，尽管多年以来，它们一直投资于国家的国际储备。这个突然的兴趣由以下几个不同因素引起：这些资金在过去数十年里增长很快，并且已经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们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司以及金融机构有着很大的利害关系，有时对某些目标公司构思的策略重要性发生兴趣；有时候它们并

图2

一连串的震荡

自199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利差同时出现波动，除了一些例外。

(利差，基点)



资料来源：Mauro、Sussman和Yafeh (2006)。

注：利差是新兴市场国家以美元发行的债券的收益率减去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基点是一个百分点的1/100。

不使其投资公开化。据某些估算，主权基金管理的良好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其管理资金数额可以通过这一小部分来体现。尽管大多数这类基金遵循着保守和长期的投资策略，但在本质上，一旦其突然转变立场，也会起到破坏性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个小规模的新兴市场国家。

除了新的投资者出现这个原因之外，面向个体投资者新的投资工具也能潜在地推动资产价格在相关国家的联动性。比如说，基于指数的投资——经由指数共同基金和最近的交易所交易基金等，这些日益兴起和流行工具导致投资在相关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指数，而不是单单是个别证券和国家。交易所交易基金是开放式基金，其显著特色是探索复制一个健全的市场指数。伴随着对特定国家的有限信息，它们的流入或流出可能导致所有潜在的有价证券价格协同波动。从另一方面说，新的金融工具的引入，比如说交易所买卖基金，也许能够帮助投资者使他们的投资组合多样化，增强市场流动性，促进投资者意愿投向个别股票和债券。跨国银行的发展毫无疑问在促进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其他冲击的传播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应对未来

预测21世纪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很有可能综合着过去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危机的性质特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融危机是对宏观经济困难这一背景的反应，但是它们明显的是被如战争或其他政治上引发的暴力事件、对机构不足的反应和政治的不稳定性等问题引发的。宏观经济政治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机构的缺点依然存在，因此未来的危机依然有可能被政治巨变所引发。当今越来越多的金融联系——包括由新的参与者所引发的，有可能导致危机很快传到其他国家，就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一样。

一个谨慎的工作设想：危机很有可能再次出现。这意味着需要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都要进行准备。在国内层面，许多国家都采取措施——包括改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和债务管理——目的是如果危机发生时，降低遭受的损害和削弱冲击。在国际层面上，这个范围内市场失灵和外部条件都需要全球的管理和协调，这个讨论关注的是国际金融机构或其他跨国机构可能发挥的作用。举例来说，建立机制承诺在危机发生时提供流动性资金。一旦危机发生，区域国家集团可以分配其国际储备从而提供相应支持。

除了增加官方流动性储备外，无论是通过自我保险形式的国家储备还是在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对储备进行国际安排这种形式——是否会对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全球治理产生其他的影响。争论很有可能集中在官方部门是否应该增强对私人金融市商的监管。尽管有些观察者建议对国际金融资金流动进行管制，但是注意力很可能将放在增加透明度、数据的提供以及改善现有的审慎规定。这就包括这样的讨论，即是否这些差距已经被最近起源于次级债市场的金融骚乱所揭示。

新的重要角色的含义，比如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尚未被充分认识，而且合理的论点能被合适的做出——基于一个纯粹的基点——那就是每一个参与者极有可能促进稳定也有可能造成波动。不管怎样，这些情景并不是很难想像，这些参与者很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和危机扩散的来源；一个认真的关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讨论是必须的。特别是，政策讨论很有可能要关注这些参与者是否需要提供关于他们投资策略和投资的信息（也就是说，要增加透明度）以及关注新（自愿）行为守则的可能性。新守则将考虑这些新的参与者。在这些领域的进展需要准确确认在不妨碍金融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哪些信息，是需要得到有效审慎监管的以及投资者应该获知的。

这是很清楚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将紧密关注这场讨论。传统上，在容易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关于避免隐性债务和相关弱点，良好管理和增强透明度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在新兴市场国家，对透明度的关注已经转移到投资方。在和新兴市场国家主权基金竞争时，投资方经常要求更大的透明度。然而，开始于2007年夏季的金融风暴将目光聚焦在发达国家金融机构透明度和维护核心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性上——这不仅对国内投资者有益，而且有利于避免有害的国际扩散。在未来的岁月里，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Paolo Mauro，IMF 财政事务部处长；Yishay Yafeh，IMF 研究部访问学者，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 Mauro, Paolo, Nathan Sussman, and Yishay Yafeh, 2006, *Emerging Markets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Sovereign Bond Spreads in 1870–1913 and Toda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dier, Tatiana, Paolo Mauro, and Sergio Schmukler, 2006, "Vanishing Financial Contagion?" *IMF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06/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全球医疗卫生 治理

如何更好地协调才能改进全球医疗卫生 状况进而提高资金利用价值

David E. Bloom

健康问题从来不分国界。在公元前4世纪，麻风病从亚洲传播到欧洲，很有可能是通过亚历山大的军队实现的。14世纪40年代，起源于中亚的黑死病迅速蔓延到欧洲和中东。在17世纪和18世纪，疾病通过欧洲侵略者横跨大西洋，这些侵略者曾大批杀害美洲本地人口。

当今时代，健康威胁日益成为全球化问题。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带走了5000万到1亿人口——远远大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人数的总和。在那段时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一体化使得各种疾病，比如说艾滋病毒/艾滋病，能够很轻易越过国界和跨越各大洲进行传播。此外，一些人认为如果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话，那么它的迅速扩散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让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健康状况不佳，能够通过其他全球化的溢出效应广泛传播。举个例子，气候变化——大部分由于西方工业化高速发展和新兴市场造成的——促成了荒漠化和干旱（这种情况导致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并且很有可能造成人口迁移（这将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和区域政策，比如像美国和欧盟对农业的补贴，将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摆脱贫困和疾病，这些疾病与贫困、不公平有着很强的联系。

随着医疗卫生体系日益全球化，新的参与者改变了原有的形式。私人资助曾经相对微不足道，然而现在已经占了对医疗卫生的发展援助的近1/4。举例来说，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已成为私人资助医疗卫生方面的主要捐助者（见表1），在全球范围内，该基金会的支出几乎占了所有私人援助的65%，比世界卫生组织每年支出的一半还要多，而WTO的花费则是由世界各国提供的。值得注意的是盖茨资助的方向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新的药品和疫苗），这将最后转换成一种提供新的直接的卫生服务的方式。

这些新的参与者明显使得投资于全球医疗卫生的可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机构是危险的。私人慈善事业不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负起全部

责任，他们的决策可能不会与受援助国家最紧迫的（或者是长期的）需要相吻合。如果他们计划不是有效率的，如果资源减少或者利益消失，依赖于这些资金的受援国将会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随着私人慈善机构的增加，存在着过多的致力于解决全球健康威胁的融资实体、双边捐助者、多边组织和商业团体，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或正在扩大。比如说私人捐助者，这些群体也不可能全部承担起全部公共健康的责任；他们往往只是间接地对国家的需要做出反应。在2005年，双边捐助者向公共医疗卫生提供了超过80亿美元援助，其中6个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占了这些援助资金的

印度尼西亚制药公司的一名雇员正拿着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80% (见表2)。许多工业国提供的援助远远低于联合国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 而对医疗援助的比例差距就更大了。

现有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是否能够适应对参与者阵营变化进行监管, 并确保合理的卫生健康问题被公平、有利、有效地解决? 答案是否定的。新的疾病已经出现, 许多国家 (包括一些相当贫穷的国家) 至少正在经历一场流行病情况的转变, 从以前的传染性疾病转变成慢性疾病, 而且这些国家承受双重负担: 他们依然有着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这是由传统的贫困性疾病造成的, 但是也面临着肥胖病、糖尿病、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是否能做点什么以修正和加强现有的治理安排, 以便能够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出反应? 本文探讨了现有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成功之处和缺点, 并就前进道路的起始点提出了建议。

全球医疗卫生取得的成就

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里, 全球医疗卫生治理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通过我们提到的治理这种方式, 政府、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做出了促进并保护良好医疗卫生状况的重要决定。同样地, 治理不仅囊括了公共和私人组织的作用, 也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和传统, 通过这些规则和传统, 这些机构相互联系并同寻求保护健康的人们相联系。治理也包括促进信息交换——关于被证明是成功的行动和策略和关于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行动和策略的信息。

最突出的成就和努力控制具体疾病有关, 但是其他项目和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遏制特定的疾病。全球免疫运动消灭了天花, 控制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的蔓延, 并且几乎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以 SARS 行动为例证。尽管起初这个疾病让世界非常恐

慌, 但在该病毒还没扩散到东亚以外范围的时候, 各国协同行动的迅速实施使 SARS 病毒得到控制。我们全球医疗卫生治理的核心——WHO 与各国卫生部门紧密合作, 而且 WTO 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受到全球性的健康威胁, 相关机构将放下自己的不同利益, 通过快速建立全球流行病、临床和实验室网络, 协调他们的行动来应对威胁。

控制烟草的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创立并领导 WHO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该公约于 2003 年通过。全球有大约 300 个组织加入了公约, 该烟草控制框架开展了一些活动, 使每年由于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成功地减少大约 500 万人, 并且和各国政府合作, 增强它们对相关科研工作的理解。同时, 这些活动也提高了公众对吸烟有害的认识, 并在政治上, 为国家抵制烟草公司的努力铺平了道路。

跟踪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预警和反应系统系统地跟踪全世界疾病的爆发。其每年对超过 200 起的疾病爆发展开调查, 其中有 5—15 起需要作出“重大的国际反应”。

研制疫苗和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药品。公私伙伴

表 2
国家捐助

少数国家占据了对医疗卫生的官方国际援助的大部分份额, 一些捐赠国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医疗卫生情况。

	双边 ODA ¹	ODA 占 GNI 的百分比	投向公共医疗卫生的 ODA ^{1,2}	投向公共医疗卫生的 ODA 的百分比 ²
美国	26081	0.22	3636	13.9
日本	15116	0.28	1156	7.6
英国	7187	0.47	729	10.1
德国	9122	0.36	593	6.5
法国	10012	0.47	394	3.9
加拿大	1915	0.34	380	19.8
荷兰	3872	0.82	318	8.2
瑞典	1947	0.94	266	13.7
挪威	2048	0.94	243	11.8
比利时	1379	0.53	142	10.3
丹麦	785	0.81	131	16.6
西班牙	968	0.27	127	13.1
爱尔兰	483	0.42	122	25.3
瑞士	1477	0.44	84	5.7
卢森堡	222	0.86	54	24.2
希腊	207	0.17	33	15.8
奥地利	1246	0.52	24	1.9
新西兰	217	0.27	18	8.4
澳大利亚	1440	0.25	14	1.0
葡萄牙	251	0.21	13	5.1
总计	85976	0.33	8475	9.9

资料来源: <http://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

注: ODA = 官方发展援助。GNI = 国民总收入。意大利和芬兰没有包括进来, 因为关于对公共医疗卫生的 ODA 的数据很难获得。

1. 百万, 2005 年美元。

2. 公共医疗卫生是卫生保健状况的总和, 包含人口政策 / 计划和生殖健康, 和饮水供应及公共卫生设施, 详细界定见 www.oecd.org/dataoecd/44/45/35646083.pdf。本栏包括了对核心艾滋病病毒项目 (代码 13040) 的援助, 但不包括对艾滋病 / 艾滋病 (16064 部分) 的社会帮助。

表 1
私人慈善事业

美国对国际卫生保健捐款的 10 大基金会中, 盖茨基金会占据绝对优势。

(2005 年, 百万美元)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895
福特基金会	24
洛克菲勒基金会	22
大卫与露西·沃克德基金会	18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13
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	10
默克公司基金会	10
百时美施贵宝基金公司	10
埃克森美孚基金会	9
斯达基金会	8

资料来源: 基金会中心。

注: 国际捐款包括跨境捐款和向设在美国的国际项目的捐款。

关系,比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配置全球资源,并促使制药公司、政府和捐助者一起努力,推动有广泛前景的疫苗的研发和分配。西方制药公司研制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及该药物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包括在印度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已经极大延缓了艾滋病人的死亡趋势。来自市民社会和信息传播运动的压力已经使得医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全球性疾病的药物价格有所降低。

全球医疗卫生的差距

毫无疑问,需要给予医疗卫生更多资金支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都集中智慧和金融资源去解决穷国正在遭受的痛苦。事实上,在8个目标中,三个涉及到医疗健康问题,其他的间接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健康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石。

一份最近对与健康有关的MDGs全球运动的报告警告说,到2015年约定期限时,这些涉及健康的目标很有可能一个也实现不了。据说,在现有的步骤中,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四个目标(降低2—3岁儿童的死亡率)直到2045年前也很难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五个目标(孕产妇死亡率降低3/4)将会很难实现,并且在某些地区,还会出现恶化;关于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六个目标,尽管在2015年以前疟疾和肺结核能够得到控制,但是艾滋病毒/艾滋病迅速传播的情况不会得到改善——艾滋病的传染依然快速发展,人数增长超过艾滋病患者中得到治疗的人数。无论如何,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公布2007年11月的“艾滋病最新情况通报”之前,全球运动得出了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悲观结论,“艾滋病最新情况通报”中指出,最终由于控制HIV/AIDS的努力,在某些范围内,新的传染正在减缓,但是数字依然巨大(据估计在2007年新增250万人)。

在一个复杂的,而且众多捐助者和政府组织缺乏有效协调的背景下,许多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没有胜者。此外,过分关注解决具体的疾病可能会模糊更大的目标:结构性条件,比如贫困和性别不公平,也能导致健康恶化。举例来说,涉及到解决HIV/AIDS问题的研究和监测项目以及金融和技术支持,尽管在某些地区取得某种程度(并在增长)的成功,但是并没有产生有效的控制方案或广泛的治疗计划;这种疾病估计在2007年夺走了210万人的生命。

现有的医疗卫生差距可以分为下面三种类型:

(1)不平等的核心。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和干净的水及卫生设施机会的不平等:大约10亿人不能获得医疗

卫生服务,超过10亿的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服务。那些偶尔有机会获得治疗服务的人,获得的也是差的甚至是有损的医治——某些情况下,甚至得到些假冒伪劣药物。清洁的水和卫生设施满足不了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缺水或因为水不清洁而造成的疾病。

在人口健康状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健康状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继续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尤其是大型的拥有大量人口的中等收入国家内,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健康状况也存在着极大差异。负责全球卫生治理的机构一直无法配置和有效地引领足够的资源去解决这些差距。他们也无法阻止“人才外流”,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卫生人员从最需要他们的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在那里他们能挣得较高的工资。

营养不良:尽管对于发达世界的人们来说,拥有着丰富充足的食物,然而营养不良的情况——表现在热量摄入和特殊营养物质两个方面——依然广泛存在于众多贫穷国家。

(2)收集和传播信息。全球疾病监测:最近印度尼西亚拒绝和WHO分享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样本就可以作为例证——印尼作出这个姿态目的是确保从这种样本中研制出一个昂贵并且很有可能是稀缺的疫苗以提供给印度尼西亚人,这说明全球监测还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发现和对疾病做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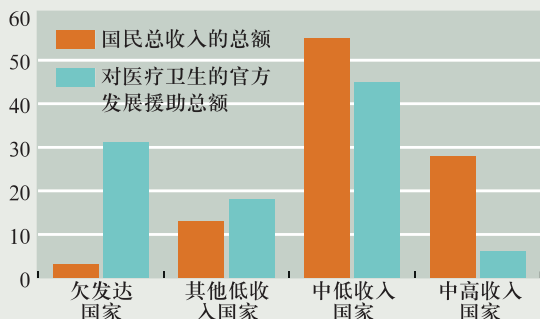
医疗卫生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古巴和斯里兰卡——还有印度的喀拉拉邦——正在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尽管这些先行者有许多有用的经验可以分享,但是全球信息共享机制依然非常落后。

(3)主要的治理问题。协调全球机构:各国政府在他们国家内寻找解决医疗健康问题时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机构,并要从这些机构中获得支持。卫生部长常常抱怨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给捐款者写建议和报告上,这些捐款者的利益、行动和进程有时是重叠的,但是往往各不相同。金融机构比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就是一个试图集中资源、简化程序的机构,但是相似的举措在医疗卫生系统(与专门针对特定疾病相区别)层面上是非常缺乏的。

衡量全球卫生机构有效性的标准: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对它们的成员国负有责任,但是针对医疗卫生成果,它们往往缺少详细和现实的目标,或者没有在为促进医疗卫生状况而采取的行动中起到中介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一个缺少责任兑现的机构来说,这种全球性的评估是很难完成的。同样,从事改善全球健康工作的双边捐助者和市民社会

官方援助对象

最穷的国家得到了超过30%的双边医疗卫生援助。
(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的接受者,不同收入组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OECD。
注:2005年的数据,在只能获得前些年数据的情况下,数据为作者的推断。对医疗卫生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不包括对没有划归到一个具体收入组别的国家的医疗卫生的ODA。

团体很少对它们的成功或失败负责。

全球知识产权法: 专利保护的法律效力因国家而异,这种法律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会使得市民社会和制药产业发生冲突,比如说,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的定价问题。各国还没有找到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也就是说既要鼓励私人部门在药品研发上投资,同时也要鼓励其对穷人迫切的医疗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

选择好主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各国政府已经在保护国民健康方面采取了行动,不过很少开展国际合作。然而,疾病跨越国界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政府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同时全球影响对于个别国家的作用开始加强。因为疾病威胁正在日益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国甚至是双边行动也已很难应对。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集中区域或全球的资源才能确保人口健康,从许多方面来讲,只有建立一个全球的公共物品才足以应对健康问题。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使公共物品作用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潜在的市场失灵。在医疗卫生领域,这有时意味着如果一个实体创造出同时也能让他人受益的新技术或者某种知识,而它不愿意尽其所能地在这个知识或技术上投资,除非它自身能够完全占有这项知识或技术的好处。其中一个例子是,由西方政府提供关于研究某些疾病,比如说疟疾的经费缺乏,这是因为这种传染病是发展中世界的主要杀手,但是在西方世界却不是(尽管它们对全球安全和繁荣有着长期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在早

期不愿公布关于SARS的信息。尽管迅速的行动将使得其他国家的卫生状况受益,但是这将会潜在地伤害中国的声誉和经济的运行,因此,它选择的是拖延发布。

需要将哪一个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治理问题放在国际合作事项的首位?第一,所有的国家必须有充足的资源来实现和医疗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双边捐助者处在国家合作努力的中心位置,以确保贫穷国家的疾病预防、治疗和护理等得到适当的资金,但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不同国家的不平等关注。这种行为因为忽略了个别国家,而对这个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的和长期的不良后果。同时也有道德上的原因,国际援助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没人有权利忽视那些生存在异常恶劣的条件下的人们。

好消息是,双边捐助者成功地将他们的医疗援助给了那些最贫穷的国家(见图)。但是尽管众多的医疗卫生专家期望外国对医疗卫生的援助能够持续增加,但是一份最新的调查(Hecht和Shah,2007)指出,这远远不确定。不仅最近的发展援助不会继续增长,而且如果捐助结果并不显著的话,医疗卫生的捐助者可能会不愿继续他们的投资。

在确保医疗保健有足够的资金中,最核心的也许是改进低效使用资源的状况。在许多国家,基本的管理和责任制(更不用说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成本收益的干预措施上)严重缺乏。

第二,有必要监测和评估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问题。这些努力应该包括对新的和现有的疾病进行监视,以及推进对威胁全球的疾病的研究。

第三,有必要制定措施来确保遵守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和应用都最为出色的规则和标准。全球标准(举例来说,食品安全、药物、医疗和其他制成品的标准;空气和水的安全等级标准;还有对当地经济条件敏感的劳动力惯例标准)能够帮助防止公共健康危机,包括那些跨境的危机。地区性规则与健康没有直接联系——比如说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以延缓全球变暖——但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线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以达到这些要求?对于全球医疗卫生来说,有多种方式可以加强治理安排,这里仅描述一小部分。

明确角色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得到了广泛合法性的公共支持,这是因为它是由会员国推选成立的,同时也必须对会员国负责。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处于一个有利位置来领导全球医疗卫生治理,尽管多数国家认

为它的作用需要加强。国际社会应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就WHO的授权是否需要扩大和怎样扩大，WHO权力机构颁布的国际医疗卫生条例是否应得到加强，WHO是否需要得到更高水平的资助等问题达成协议。世界卫生大会（WHO的决策机构）需要考虑建立新的机制，从而使全球医疗卫生的其他行为者参与进来。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理和区域结构需要进行改革，以便满足世界卫生组织新的需要。

加强经验的分享。随着各国追求长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和积极探索新的政策，系统地传播关于不同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成功和失败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更广泛的协调。广大的捐助者都是工作在一个狭小的具体的疾病领域，但是他们未必必要享有一种相似的气质，更不论类似的方法。正在制订的全球指标将呈现与捐助者计划相关的医疗卫生成果，推动捐助者提高责任感，从而集中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干预。国际医疗卫生伙伴关系也是非常有用的，该项目发起于2007年，其目标是“增强对国家医疗卫生计划的各种支持间的协调，促进国际卫生组织、主要的捐助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该合作关系是与新成立的医疗卫生机构峰会（也就是“医疗卫生8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行动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基金合作以及盖茨基金会）协力建立起来的。

解决医疗卫生中的不公平状况。捐助者和受援国政府必须加强合作，以便确定和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议程。许多国际上的努力主要是对付特定疾病的，但造成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必须得到解决。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是贫穷国家产生持续健康赤字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对医疗卫生有着影响，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包括贫穷、人权、性别的失衡、以及穷人无力改善获得高质量医疗保健状况，这些都需要关注。决定健康的更重要因素，例如水和卫生设施、污染、工作场所的安全性、道路安全以及暴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协调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医疗卫生治理和安排需要支持和获得其他国际协议的支持，包括解决劳工、贸易和环境等问题的协议。一种检验这种协议的方法，就是询问他们是否确切地帮助穷人获得了医疗卫生服务。

其他相关的医疗卫生领域参与者。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能够帮助协调地方和全球的努力。相关组织的积极行动已经开始谋取企业的支持，以促进全球医疗卫生的发展，这些组织包括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卫生行动组织等已经开始支持由私人运作的、非盈利企业为促进全

球医疗卫生事业而开展的活动。举个例子，印度的Aurolab正在积极帮助使穷人享受到医疗技术的服务。虽然如此，潜在的跨部门合作还远远没有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应该担任起监测、评价和对“健康责任”等级进行排名的职责，很大程度上，这个排名是根据他们的“绿色指数”进行排序的。

对国家治理进行评价。较好的国家治理（例如减少腐败、提高官员的能力、采用或加强民主的做法，以及确保中央的决策在社会中最穷和力量最弱小的部门中也能得到落实）将有助于国家发现能够应用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金融资源。尽管这非常重要，但是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使卫生部门依然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一项更有针对性的战略往往是比较重要的，详细地复查一个国家的支出，这种复查是带着明确的目标的，就是使更多的资金份额改流到医疗卫生领域。

当我们向前迈进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治理不仅仅是在这讨论的机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机构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标准。我们也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市民社会参与这样一个讨论，讨论的内容是我们想要达到的良好的治理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寄予这两者以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共享不仅仅是技术信息的交换，而且是价值观、期望值和责任感的交流。

没有富国和穷国的互相交流，上述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在贫穷国家中，威胁健康的疾病即使对经济、社会稳定、国内安全没有广泛的影响，向它宣战也是一件十分正确的事。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疾病传播对于全球社会，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可能造成的后果，促使建立一个强有力医疗卫生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David E. Bloom,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和人口学
Clarence James Gamble 名誉教授。

参考文献：

Hecht, Robert, and Raj Shah, 2007, "Recent Trends and Innovations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in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nd ed.*, ed. by Dean T. Jamison and others (Washington: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way,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2007, *Report of the Global Campaign for the Health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vailable at www.regjeringen.no/en/dep/smk/Selected-topics/The-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Global-Campaign-to-Reduce-Maternal-and-C/ The-Global-Campaign-for-the-Health-Mille.html?id=481776.

For references to additional papers cited herein and a short bibliography, see this article on the Internet at www.imf.org/fandd.

观点 全球医疗卫生系统

3 三种关于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如何改善的观点

2000年9月，全球社会吹响了到2015年实现八个千年发展的目标的喇叭——其中三个聚焦于医疗卫生：减少婴儿死亡率2/3；减少母亲死亡率3/4；阻止和开始扭转艾滋病、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传播。余下8年，我们如何去做？答案并不理想；事实上，世界看起来实现不了这三个目标。问题是否是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现在已经过时和变坏了并且需要全面修订？金融与发展调查了一些主要医疗卫生参与者的观点。

1

让市场发挥作用

Joe Cerrell, 比尔和米林达盖茨基金全球健康政策和宣传部主任

最近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挽救生命的成功——从全球根除天花到较小的日常胜利，比如在上世界战争最肆虐的避难营接生健康婴儿。然而医疗卫生系统也有失败的地方，每年200万儿童死于疫苗能够预防的疾病；数百万人死于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并且在动用财政和科技资源给世界上每个出生婴儿以获得一个平等健康生命的机会方面也失败了。

但是断定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已经坏了的声明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失望，甚至可能是挫败。事实上，全球医疗卫生系统不是不可修补的。随着资源的增加，政策的改善和政治意愿的加强，在发展中国家改变医疗卫生条件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是可能的。并且由于传统地理界限的模糊和国家命运的交缠，改善全球医疗卫生不仅仅是道德上要做的事情：它对于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也是必须的，不论穷国还是富国。

而且，有观点认为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应对健康与否负责，排除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涉及到全球医疗卫生

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助这个系统，使它运行的更好，包括发达国家、多边组织、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包括基金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

修补全球健康系统需要很多战略。一个前些年被忽略但具有极大潜力的战略是利用市场动力的优势。

市场——从地方的手工市场到全球市场——已经成为提高发达世界数百万人生活水平的核心，并且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前景。但是有时市场需要一些平台才能够有效运行：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个值得奖赏的个人，因为他们在解释激励、信息和结构如何作用于市场的运行、“区分出市场可以良好运行和市场不能良好运行的状况”做出了贡献。影响与全球医疗卫生相关的市场动力能够带来与我们已经在发达国家看到的相类似的转变。

全球医疗卫生一些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市场不能够为穷人服务。每年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死于这些疾病，包括疟疾和肺结核，而这些疾病在富裕国家已经根除。对于这些疾病，市场经济从商业上证明大规模投资于发展和制造疫苗和药品是不足的；例如，肺结核的治疗和预防依然是基于仅仅部分有效并且落后尖端科技几十年的药品和疫苗。

通过全球倡议，比尔和米林达盖茨基金通过推进创新性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从而解决了市场失灵，这

坏了吗？


个机制为私人部门供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了较好的激励。指导原则就是把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汇集到一起处理由于市场失灵而导致的穷人医疗卫生总体供给不足。

我们支持一种有前途的机制：先期市场承诺（AMC）。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先期市场承诺被设计用来保证向被忽略的疾病疫苗发展的市场可行性。通过对生物工业学和制药公司在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创造强有力的资金刺激，使在被忽视的疾病上的投资变成一个比较可行的商业决策。

2007年2月，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盖茨基金担保15亿美元给第一期的先期市场承诺去加速针对肺炎性疾病疫苗的发展，这种肺炎性疾病是肺炎和脑膜炎的主要病因，每年导致160万人死亡。我希望近期启动肺结核和疟疾方面的先期市场承诺。

另一个我们支持的创新融资机制，即国际免疫融资便利（IFFIm），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受法律约束的、长期捐赠承诺的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些资金支持像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样的组织的工作，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支持贫困国家儿童免疫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筹集了10亿美元，并且计划在将来20年支出另外的40亿美元，进而有望挽救500万人的生命。

对于每日生活少于2美元大约20亿人——他们的健康保障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市场不能够很好地运行。像先行市场承诺和国际免疫融资便利这些新的融资方法正显示出令人激动的成果。在头几年，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方法让市场更好地为世界最贫困人口服务。



发现统一的景象

Helene Gayle, CARE 主席
J. Stephen Morriso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处主任

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坏了吗？是，也不是。它能够改善吗？是的，在长期可以通过努力和参与得以改善。

当前，全球医疗卫生的行动出现在许多有差异的分散化、半自治的实体。全球医疗卫生几乎不能组成一

个系统，如果从系统方面来看，我们意味的是一个统一、一致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有一个清晰定义的框架，配备可操作的决策管理机制。

现实中，全球医疗卫生系统是一个松散和流动的联合，这个联合是多重的、变动的影响中心。它包括世界卫生组织、22个负责不同类型医疗卫生项目的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和新的国际实体，比如抗御艾滋病、肺结核和天花全球基金。它包括西方的双边捐赠者；生活在存在重大疾病负担和为克服脆弱制度能力而斗争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像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势力，它们既是援助的接受者，并且日益是援助、新政策模式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来源。这个系统包括超过120个针对具体医疗卫生问题的公私合作伙伴、操作和倡议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以及公司。

“国际上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这个十年，发展中世界提高公共医疗卫生的国际动员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全球医疗卫生的重要性的意识已经扩散；新的标准已经生根；新资源以历史空前水平用于获取切实的、正面的医疗卫生效果。大量脆弱、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在改善。

一些关键因素驱动了这些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以改善全球医疗卫生而冲锋的国际和双边机构之外。传染病本身已经是一个关键性的推进因素。到这个十年初期，流行的艾滋病出现了一个不能忽视的戏剧性、大规模和显著的变化。这种推进被萨斯（SARS）、禽流感 and 大规模抗药性肺结核所推动。

像 Bono 及其他名人一样，世界的领导号召实施行动。新成立的盖茨和克林顿基金已经开始行动，正如新媒体倡导的大众能承担起药物治疗，否则企业员工和企业形象将受到威胁，进而削弱企业力量。

直到最近为止，当全球医疗卫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不充足的资金，不足的动力和被大大地忽视——协调、统一的系统的缺少好像是个小问题。当全球医疗卫生在最近十年逐渐变成几乎是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主流，并且当承诺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资源急剧和显著上升时，混乱场面变得到处可见，我们开始怀疑这个系统是否已经跨台。实际上，它没有分崩离析。它仅仅还是像以前一样混乱，作为一个优先考虑它

落后于全球医疗卫生的进步。

近期松散的系统有着明显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它鼓励创新、加速和灵活性。但也存在内在的、复杂的问题，当全球医疗卫生的危险上升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国际上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并且已经显示出在最小化捐赠者的羊群行为和官僚报告负担的堆积方面取得较少的成功。持续的动力和提供满足实际需要的充足资源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由于不断恶化的竞争环境和商业运作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健康状况长期不佳这一方面，我们很难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而得不到理想的成果。与此类似，环境变化、饮水安全、债务豁免等问题都可以放置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探讨（在对全球医疗卫生问题的关注范围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主要的捐赠者面临严重的内部挑战。在美国实施海外医疗卫生项目的机构之间，没有统一协调的远景预期引导美国的行动。相反，却存在一系列不相联系的发起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单单美国是这样。

后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特别在像艾滋病具有高优先考虑的项目。即使有资金支持的不间断注入和政治领袖献身于全球医疗卫生，但是还是可以预期折磨当前全球医疗卫生的复杂的、没有解决的挑战将变得更加费力和费财，而不是更少，并且将开始检测当前安排的局限性。现在是开始认真讨论如何通过构建一个较好运行的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的集中的多边和公私论坛的时候。



瞄准医疗卫生千年发展目标

Tore Godal, 挪威首相特别顾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任执行秘书。

到2015年实现医疗卫生千年目标(MDGs)——减少婴儿死亡率；改善母亲健康；与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做斗争——将很困难。尽管已经取得进步，但很多国家还未达标。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除非国家、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伙伴重新开始其行动，否则儿童和孕妇的死亡率将继续高的惊人。

一个尝试解决已经存在的全球医疗卫生援助框架的低效率的办法就是针对千年健康发展目标的全球行

动。这个快速展开的运动包括几个针对加速进程的行动，这些行动基于以下基本原理：

- 成员国决定自身的医疗卫生优先发展项目，并且制定全国医疗卫生计划并去完成。援助机构将协调其工作去配合和支持这些计划。

- 援助机构将不会增加落在政府和健康工人头上的报告、信息收集和管理需求。

- 结果将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所花费的钱与在妇女和儿童健康、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相联系。

- 援助机构将以加强成员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工作。这意味着增加资金的灵活性使成员国能够针对当地的需要和确保熟练的健康工人和药品在需要的地方。这也意味着制定和承担长期责任。

- 所有各方都将从开放性和责任感中获益，主要受益人，包括其税收花在发展项目上的选民和慈善事业的捐赠者。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知道钱被花费，医疗卫生保障以一个公平、开放、诚实和有效的方式提供。独立的评价程序对这个原则非常关键，并且确保资源有效运用。

2007年9月26日，在纽约挪威首相Jens Stoltenberg宣布的这个运动做出了要发现实现资金价值较好的方法并确保最脆弱的人群获得必要服务的承诺。在启动的那天，一些最大的发展援助捐赠者承诺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第6期（时间2008—2010年）融资97亿美元——与艾滋病、天花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这个运动包括其他发起者，比如由英国首相 Gordon Brown于9月初设立的国际医疗卫生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的目标是改善对国家医疗卫生计划支持的协调，并且把发展中国家、国际医疗卫生组织和主要捐赠国家汇集到一起。

因为这项活动的原则强调工作要迎合国家医疗卫生计划目标，因此行动将被调整以适合每个国家并且包括每个国家的医疗卫生计划。合作伙伴将有义务围绕国家医疗卫生计划协调行动并且和政府从事“对话”。

发展伙伴将密切协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工作，这将被新成立的医疗卫生机构领导所推动（“医疗卫生8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艾滋病、肺结核和天花斗争的全球基金；比尔和米林达盖茨基金）。

后向预测： 拉丁美洲

Luis A.V. Catão

拉丁美洲在传统上被认为经济上具有波动性。然而这个地区却很少有人做有关商业周期演化并把其主要特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工作。令人有些惊讶是因为商业周期的波动性可能受政策体制影响，并且拉丁美洲已有相当多政体的急剧变化。

这个区域有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政策体制的主要变化如何影响商业周期，以及共同的外部因素对周期性结果起关键作用吗，可能与政策体制同样或者更加重要吗？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缺乏数据妨碍了有关研究。新的技术试图通过重建或者后向预测为那些缺乏的数据提供添补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这些方法与经济学家已经用于识别和预测商业周期的方法类似。

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已经经历了从高度开放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大危机前的半个世纪）政策体制到对外部联系极端封闭（大危机后的几十年）的政策体制的转变。然后，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果断地向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强劲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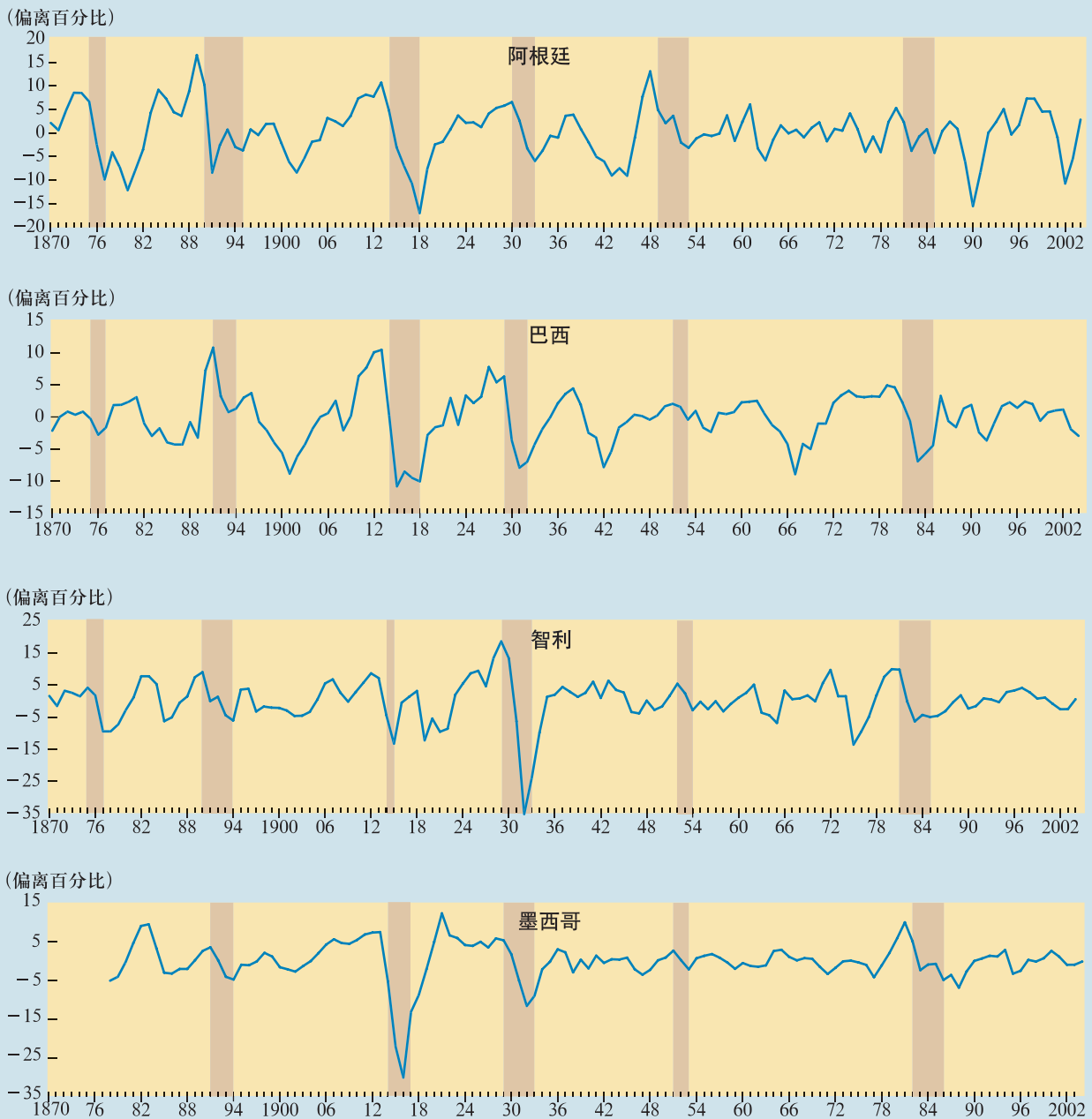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相关讨论，即这些可相互比较的政策体制哪一个（如果是任何一个的话）导致拉丁美洲经济较大的不稳定性并不断地受到冲击，进而加大了经济危机的风险和深度。一个观点就是 Raul Prebisch (1950) 的看法，认为这个区域的周期波动大体起源于金融和贸易的开放性，因为对初级产品的价格和世界利率水平的冲击，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倾向于加剧产出的波动。

回顾一个最具波动性地区的商业周期需要重构 GDP 数据。



发掘类似周期

基于后向预测的数据，1870—2004年拉丁美洲四个最大的国家显示出对趋势类似的偏离，这暗示存在共同因素在影响产出。



资料来源：Aiolfi、Catão和Timmerman (2006)。

一个可对比性的观点认为开放性减轻了政策诱导性的波动，因为其严格纪律效果——开放经济面临着就业和通货膨胀不太严格的替代(Romer, 1993)和债务拒绝较高的费用(Rose, 2005)。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当用数据来衡量时哪一个观点能够胜出？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与国际比较紧密的联系对整个地区商业周期的共同作用程度及其共同作用是

如何演化的。这是与IMF尤为相关问题，IMF负责对全球金融稳定性进行多边监督。这也与世界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等机构有关，它们负责该地区的重要的文件披露。共同商业周期因素的力量可以解释为具有恶性“传染”的事件，这些事件使这些国家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难以偿还债务。而且在一个地区共同商业周期因素越强，在国家之间分担风险的价值就越小。那将影响比如创

建一个地区发展银行或者在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合作提供流动性的政策初衷。

创建一套新的数据

从一种比较宽广的历史远景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需要涉及到不同政策体制商业周期的指标。对于拉丁美洲,像诸如GDP数据不可获得或者不可靠,特别是二战之前,并且由于数据的缺失,对这些国家周期行为不同期间的比较带来了不准确的推论,进而导致关于关键性政策问题结论的误导。

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创建了一种新的实际GDP重构方法以填补数据的缺失(Aiolfi、Catão和Timmerman, 2006)。在这种新方法中,我们给出了对整体的商业周期适度正确的估计能够从现实宏观经济、金融和部门指标的整合中重建,至少在拉丁美洲,这些数据指标可以后向预测到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方法的基石是经济变量的交叉部分存在相似的要素结构的思想。也就是说,任何单个经济变量(比如制造业产出、投资或者货币供应)的波动都来自作用于经济中的所有单个经济变量和这些变量的特殊组成部分的共同因素联合体。这个方法暗含Burnsand Mitchell (1946)对商业周期的开创工作——这种方法通过考察大量经济变量的共同变动来探求识别整体商业周期——而且在最近的计量经济文献中已经很严格地规范化了(Stock和Watson, 2002)。

虽然这些模型通常用于预测目的,但我们也表明其能够很好得用于后向预测——也就是说,重建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数(见专栏)。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重建四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LA-4)——历史实际的GDP数据估计——时间范围为1870—2004年(见图)。因为这四个国家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内占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的70%,该样本是这个地区整体宏观经济表现的合适代表。

“在一个地区,
共同的商业周期因素越强,
国家之间风险分担的
价值就越小。”

对拉丁美洲的后向预测

因此我们的后向预测表明了什么?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高度开放年代,拉丁美洲四国(LA-4)平均商业周期波动通常要比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的多。尤其,周期波动比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其他“新世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的多,并且明显比拥有大量初级生产部门的美国经济更高。

填充缺失的GDP数据

我们如何构建在1870—2004年这段期间这个地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个最大的经济体缺失的GDP数据?我们使用一种称为后向预测的方法把每个国家130年左右的可靠的GDP数据汇总。

每个国家缺失的GDP数据从长期存在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获得大约25个经济统计量,比如制造业产出、农业产出、一些服务业产出、投资和金融数据,其中包括货币供应量和国内利率水平。这一技巧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每个经济指标可以分解为三种基本的影响,即自己过去的行为,作用于所有统计量的(一些比另一些影响更强)经济宽度(或者一般)影响,仅仅对某些特殊统计量(比如干旱对农业的作用)有影响。每个经济体由大约25个方程代表,一个方程代表一个变量。

使用一种经典的被称为“基本元素”的统计方法,经济宽度因素被提取出来,为每个单独的时间序列赋予一个权重(或者相关系数)——共同要素对指标行为的解释越有力,权重越大。然后这些共同因素与二战以后已经存在

的良好的GDP数据相关。在相关关系建立和相关系数决定以后,则运用共同因素去重建或后向预测缺失的GDP数据。

使用的方法与分析者用于预测将来GDP的方法类似。一些检验被用来评估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包括将其应用于美国数据。作为一个检验,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于美国商业周期,并且与已经存在的良好的美国GDP数据相比较。这种方法在衡量二战之前美国商业周期的时间和大小做的确实很好。

接着,我们使用那些GDP数据去发掘共同经济因素同时驱动所有国家总产出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因为在大多数时期,国家之间存在微弱的经济或金融联系,所以任何作用于地区周期行为的因素都可能来自于地区外部。

为了发现作用于整个地区的某个因素或某些因素,这四个经济体的数据整合的像一个国家。该方法与用于发掘有助于预测每个国家GDP周期的共同因素的方法类似,这种过去用于分离作用于地区商业周期的影响。毫无意外,在发达国家的产出和利率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相关关系确实存在,尽管其重要性随时间而改变。

其次,大量数据显示在商业周期波动和开放度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在大危机之后流行了40年的内向型经济——其特征是进口替代,较大的政府和严格的贸易和资本账户管制——扭曲了相对价格,其结果要么像阿根廷在当时就拖垮了长期经济增长,要么像巴西和墨西哥在以后的1982年债务危机中拖垮了长期经济增长(Taylor, 1998)。然而,这些数据却显示:当世界产出和实际利率波动在最高点时,这些内向型的经济体对减少产出波动是有助的。

“最近这一地区大量的 资本跨国流动趋势可能不太 有利于单个国家的风险分散。”

然而,拉丁美洲的波动在过去15年左右正好下降到了历史低点,同时,尽管出现像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一些重大金融危机,但这些国家已经走向较高程度的贸易和金融开放。当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了“大调整”的时候,在过去20多年处于比较开放的拉丁美洲四国(LA-4)商业周期下降到历史低点,这表明了依靠诸如世界经济波动等其他因素开放度能够提高或抑制周期波动。

第三,当拉丁美洲四国经济被诸如世界利率上升这样的震荡冲击时,对产出的影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伴随着周期的波动,1929年之前周期持续时间最长,在整个20世纪70年内向型经济体盛行的时候,周期持续时间下降。在整个1870—2004年这段时期,拉丁美洲四国(LA-4)周期持续仍然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因为一直存在推动产出波动的影响,结果就是程度较深和时间较长的周期。

结论是较大的开放度和较高的周期波动或者其持续时间不是一定正相关。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

一个共同的地区周期

与这个背景相反,一个疑问就是是否存在一个重要的商业周期共同因素对这些经济体的作用不受不同国家在政策或政策体制差异的影响。通过将每个国家的不同部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汇总,并且从中提取其中的任何共同因素,我们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衡量共同因素(并且其趋势是推动整个地区的更大的经济同步

性)。拉丁美洲四国的后向预测的国内生产总值显示了每个国家商业周期在时间和范围上呈现出相似性,这种情况暗示了这四个国家经历了共同的地区影响。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之间很少发生金融联系(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是和欧洲或者美国发生的)。因此,努力的方向是发现共同的外部因素。

我们发现了什么?显然,在拉丁美洲四国,几个主要的周期转折点大致同步——特别是,这些低迷时期和1890年著名的巴林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溃和始于1982年的债务危机相联系。在整个1870—2004年间(见表,上半部分)地区因素和单个国家周期始终比较一致。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封闭体制中这些相关关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但不是很多——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种弱的相关关系一定导致较小的地区共同性。在这段期间,这种有目的的严格的贸易和金融控制必定显著地减少了共同的外部影响,并且无关紧要的区域内贸易不能够解释共同的周期行为。

共同的地区(或世界)因素与单个国家周期的相关的关系再次加强了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各种不同的外部冲击,但1988—2004年再次下降。在后一阶段,我们估计的那个点与智利有一些不相吻合,与墨西哥不相吻合。然而我们的计算也显示了共同的地区因素对两个国家仍然是切实不可忽略的。

共同因素

对于在1870—2004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拉丁美洲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一个共同的外部因素影响……

	1878-1929	1830-1970	1971-1987	1988-2004
阿根廷	0.68	0.56	0.29	0.80
巴西	0.80	0.66	0.63	0.60
智利	0.70	0.82	0.84	0.74
墨西哥	0.86	0.75	0.83	0.43
均值	0.75	0.71	0.73	0.67

这个共同因素被证实主要是外部经济产出和利率变动,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1880-1929	1930-1970	1971-2004
外国实际利率 ¹	-0.19	-0.20	-0.23
外国产出 ²	0.23	0.12	0.42

资料来源: Aiolfi、Catão 和 Timmerman (2006)。

注: 对于表的上半部分来讲, 其值越接近于1, 那么拉丁美洲四国地区各国GDP共同变动的周期的相关性就越大。

¹ 英国和美国3个月期的债券利率(或者短期等价物)。其正负号则表明了影响的方向。例如, 1880—1929年外国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 将导致拉丁美洲四国GDP相对趋势0.19个百分点的下降。

² 产出缺口以8国集团实际GDP(相对趋势的偏离)的加权衡量。外国经济体产出缺口的增加(实际GDP低于其趋势的量)将导致拉丁美洲四国产出缺口的增加。1971—2004年8国集团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拉丁美洲四国增加0.42个百分点。

什么造成了这些共同地区因素？在1930年之前的政策体制中，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和真实利率和共同的地区周期呈现出非常密切的关联。外部产出差距每上升1%（也就是说，当外国产出比趋势产出下降1%时）一般就会导致拉丁美洲四国产出缺口增加0.23%。实际外部利率的上升存在类似大小的消极效果（见表，下半部分）。

很有趣的是，这种外部利率效果在1930年以后的内向型经济体维持大约相同的大小，这表明在削减同发达国家的核心金融市场的联系方面，资本控制还不是特别有效。相比较而言——贸易保护主义角色的贸易政策和这个地区贸易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存在相当弱的一致性——外部产出的影响减少了一半，达到0.12%。1970年以后，情况出现了急剧的逆转，地区周期对世界产出反映变得比较明显——外部活动每1%的变化对拉丁美洲四国产生0.42%的效果。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产出和利率周期在过去20多年已经调整，在拉丁美洲四国的表现表明如此“大的调整”对这四国的商业周期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区域安排的局限性

证据也表明区域风险分担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从这一点来看，最近在这一地区较大量的资本跨界流动的趋势可能不是太有利于单个国家的风险分散，甚至在其他方面拥有重大收益。这些地区性风险分担的有限范围也意味着最后贷款安排国家和机构的角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和机构是这个区域外的，但为区域内的国家提供资金。

比较稳定的世界利率和发达国家较大的商业周期的调整在整体上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拉丁美洲最近外部的良好环境是重要的。数年可能是评价与历史基准相关的业绩的适当时间。数据显示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这与较好的政策管理和已经减轻的政府干涉的扭曲范围和政策诱导的不稳定性的制度改革有相当的一致性。然而，数据也显示了这些改善中部分（特别是

商业周期波动的下降）反映了异常良好的外部条件。周期波动的下降并不仅仅属于拉丁美洲，通过大范围的观察，新兴市场国家低于这个点。

并且，拉丁美洲的商业周期的表现依然落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拉丁美洲的波动仍然高于亚洲和新兴欧洲，持续时间也长于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任何其他地区。在周期指标上的这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伴随着大规模冲击的可能性的较长的周期持续时间倾向于提高利率的传播速度和债务危机的发生率并因此拖垮经济增长（Catão、Fostel和Kapur，2007）。

“拉丁美洲的波动
仍然高于亚洲和
新兴的欧洲，
持续时间也长于
任何其他地区，
包括非洲和中东。”

Luis A.V. Catão, IMF 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目前已离开到泛美开发银行。

参考文献：

- Aiolfi, Marco, Luis A.V. Catão, and Allan Timmerman, 2006, “Common Factors in Latin America’s Business Cycles,” *IMF Working Paper 06/4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urns, Arthur F., and Wesley C. Mitchell, 1946,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Catão, Luis A.V., Ana Fostel, and Sandeep Kapur, 2007, “Persistent Gaps, Volatility Types and Default Traps,” *IMF Working Paper 07/14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ose, M. Ayhan, Eswar S. Prasad, and Marco E. Terrones, 2006, “How Do Trade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Volat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9, pp. 176–202.
- Prebisch, Raul,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 Romer, David, 1993, “Openness and Infl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8, pp. 869–903.
- Rose, Andrew K., 2005, “One Reason Countries Pay Their Debts: Renego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 pp. 189–206.
- Stock, James H., and Mark W. Watson, 2002, “Macroeconomic Forecasting Using Diffusion Index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20, pp. 147–62.
- Taylor, Alan M., 1998, “On the Costs of Inward-Looking Development: Price Distortions, Growth and Divergenc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pp. 147–84.



非洲缺少

马拉维卡穆足中心医院的外面，病人的家属正在准备食物。

针对保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援助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Abdoulaye Bio-Tchané 和 Etienne B. Yehoue

根据相关说法，非洲最终走上了经济增长之路。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经历第四年增长而且预测明年增长也同样强劲。较高的石油收入、高涨的日用品价格和债务减免的增加都正与贫困作战。尽管非洲部分地区仍然受战争折磨，并且由于腐败而变得前途黯然无光，其他地区整体经济业绩的改善和良好的政策正在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点之上。但是这些好消息是否是暂时的？

看看有关数字就会终止这种想法。尽管近几年有些进步，但非洲当今的人均收入仍(以2000年美元衡量)低于25年前(见图1)。并且至少到目前为止，非洲陷入了经济政策“停停走走”的循环和社会冲突之中，这些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高通货膨胀。

然而，非洲比较低的人均收入不能由教育和资本水平的下降来解释。社会经济指标显示当今非洲居民要比25年前接受更多的教育。事实上，小学入学率现在超过了90%和中学入学率也在上升，虽然只有30%左右(见图2)。同样，

成年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59%和年轻人的识字率将近70%。虽然这些不可能是对人力资本的完美衡量，但是它们却表明了在大陆上人力资源还没有恶化。

同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资本流量在过去30多年中已经增加，大量的援助流量和最近的债务减免使该地区受益。流入非洲的援助还不能满足千年发展目标的需要，但大量的涌入已经引起关注并且甚至对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形成挑战。然而，不断上升的援助流量还是不能够确保次大陆的经济发展(见图3)。也就是说，援助流量虽然很重要，但教育和资本还不足于支撑非洲的高速增长。

因此维持非洲增长缺少的因素是哪些呢？无疑地，像疟疾和蠕虫病这样的热带疾病对健康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从前殖民地继承而来的制度也影响了非洲现有脆弱的制度，这些都已经成为不宜于经济增长的阻碍条件。但是本文主要关注那些经常被忽略的、影响非洲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推动创建一个独立、公正并



因素

被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支撑的政府机构的需要，有效率的私人部门和可以预见政府行为的制度。有针对性的外来援助将有助于这种类型的管理框架的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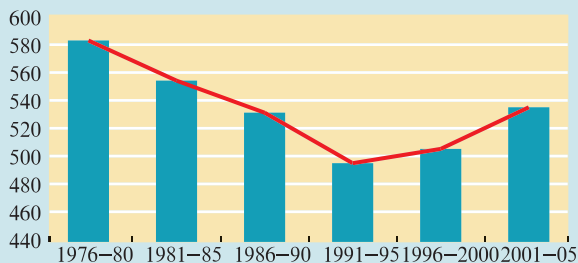
不充分的民主

尽管次大陆有新的增长，非洲的状况却不如存在同样经历的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也都已经采取能够带来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政策改革。原因是什么？非洲已经尝试过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大体上，两者都没有提供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自独立以后，非洲一直被独裁政府统治。事实上，1946—2000年间，非洲民主政治只有189个国家一年，相比较而言，独裁政治却有1,823个国家一年 (Golder和Wantchekon, 2004)。在刚独立后的早期选举中，存在大量的政党竞争因此选民有一定的选择余地。然而，

图1
缓慢追赶

尽管非洲最近取得了进步，但是仅仅返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水平。
(人均GDP, 5年的简单平均, 2000年不变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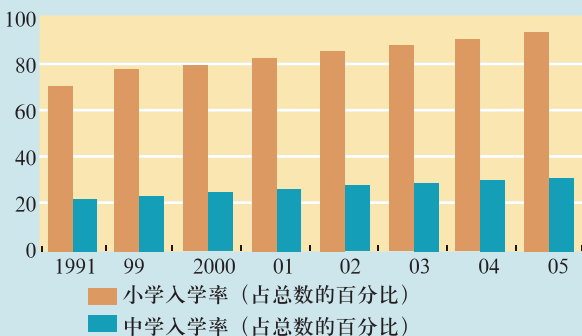
也许因为缺乏民主的文化或传统，竞争的多党选举很快被一党制代替。

在独裁政治下，政府拥有完全的自治而且不照顾特殊利益团体。但是这种政权制度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一些情况下不存在经济增长）。相反，他们破坏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对于约束政府对社会的行为、提供对于政策目标的持续协商和再协商的制度性渠道非常重要 (Evans, 1995)。

在这些政体下的政府缺乏人才智力资源和分散的个人决策优势。在一些情形下，这些政府变成掠夺性的，藉由抽取租金或以社会为代价支付租金使腐败加重。显然，非洲独裁政治并没有对具有责任感、与全体利益一致的、高素质精英管理的自治模式起到示范作用。结果，他们破坏了经济发展并且由于这样做，为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政治民主体系提供了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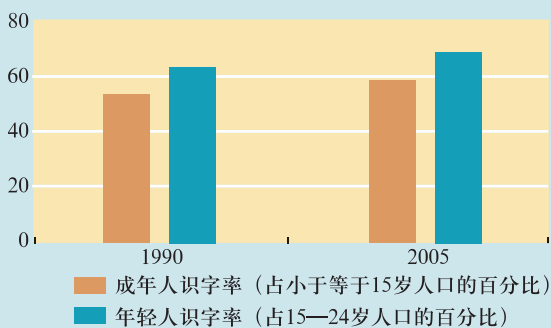
图2
更好的教育

非洲学校的入学水平正在改善……
(百分比)



注：资料来源并没提供1991年之前和1992—1998年之间的数据。

……识字率正在上升，表明了教育水平不是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资料来源仅提供了1990年和2005年的数据。

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非洲的许多民主化经历。事实上，除了四个国家之外，20世纪90年代非洲所有其他国家都上演了某种类型的竞争选举(Bratton和van de Walle, 1997)。然而，出现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还是没有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被密切关注的新政治图景似乎显示，在非洲过渡到民主政治过程中所出现的政党都在走种族线路。许多国家种族政党已经繁荣，而在那些存在种族高度分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赢得普选的绝大多数。

“源自于高度政治化管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不协调性使政府不能解决集体问题及其超越个体或集体利益的问题。”

候选人通过形成一个联盟来赢得总统大选。这导致“拥王者”的出现，种族群体或政党领袖被认为代表其所属群体的偏好。当多数选民不了解情况的时候，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拥王者能使种族群体中成员的选票集中，而不至于使选票分散在多个党派上。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即使一些拥王者的偏好不完全与群体成员的偏好一致的时候(Yehoue, 2007)。

选举前，在这些情形下所形成联盟是基于候选人给予拥王者行政职位的承诺，或者给予拥王者的其他租金以交换其认可，去吸引其群体成员的投票。通过这种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必须在当政时偿还拥王者，以维持他们的持续支持。这就形成了偏爱主义和庇护主义；

不称职的人被委任到关键的行政职位。因此，新的拥有选举权的种族领袖利用其新的投票权购买支持或者从政治机器中掠夺特殊利益。换句话说，他们用政治权力与金钱交易。

这种新的政治动力减少了政府自治。因此，种族群体不知不觉地扮演了租金抽取手段，进而带来了高度政治化的行政部门和普遍的腐败。

源自于高度政治化管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不协调性使政府不能解决集体问题及其超越个体或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规则和决策是被用来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的商品。这就产生了政治规则和决策的不可预知环境。在这些体系中，国家权力减少私人的生产能力，商品流通和增长也存在困难。因此仅仅实施民主政治不是经济良好表现的充分条件。至于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则超出本文的范围。

前景

非洲的出路在哪里？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管理，而良好的管理恰恰需要有良好的组织的政府。基于素质、选择性较高的招聘将有利于有效政府组织框架的建立，而这种招聘创造了责任感并促进全体利益的一致。同时，与周围社会结构一定程度的隔绝能够使政府采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换句话说，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技能或者有效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并且一定程度的政府自治对于良好的治理进而对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

政府需要与周围的社会结构隔绝以避免被种族或特殊利益群体所左右。一个自治的政府会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上进而采取刺激增长的政策，限制腐败，促进责任感。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言论自由、促进市民社会和公共机构（这一方面可以鼓励财政的透明，另一方面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以增加就业和积累财富）的发展来实现政府自治。

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不仅对于使政府从拥王者手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政府更负责任是重要的。私人部门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为那些有可能从事腐败的政府官员提供财政收入机会。最后，透明财政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保持政府诚信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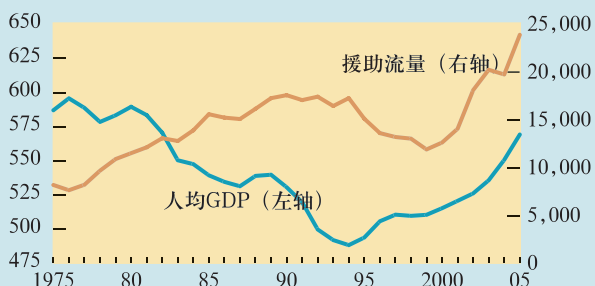
培育市民社会。在民主政治早期，拥王者能够较为容易地利用种族群体抽取租金是由于大部分选民不了

图3
对非洲更多的援助

高的援助流量并非必然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前兆。

(2000年不变美元)

(百万，2000年不变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解情况而造成的。这些不了解情况的选民相信其利益会被属于自己种族群体的领袖最好地捍卫。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变得见多识广之时,他们开始超越种族身份来看待问题,因此减少了作为租金抽取手段的种族群体的影响。那时,选举才能有效地履行监督政府官员的功能,并且腐败将会减少。

这一动力发生在当了解情况的选民处于有组织而且有活力的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通过非政府和其他私人组织使选民对有关议题敏感并且为政治自由提供培训。

在政策舞台上,市民社会在反腐方面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一个政府不能够仅仅反腐因为它只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尽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部门在反腐方面具有较少的合法性,但是私人部门可能被认为是腐败活动的创始者和受害者(Bio-Tchané和Montigny, 2000)。作为第三个部门的市民社会具有合法性,并且通过提高不公平意识和透明度与腐败作斗争。当然,这在言论和交流真正自由的地方更容易。有利于信息流动和帮助有文化选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发展市民社会是关键性的。

因此,需要鼓励言论自由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强信息流动以产生见多识广的选民。当民主政治成熟和人们通过市民社会变得见多识广之时,政府就可以从周围的社会结构中收回一些自治。在需要人口政治支持的国家—社会关系平衡过程中,政府就可以采取促进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不受有直接要求的政治势力影响的项目。

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在大部分非洲国家,通过私人活动积累财富的机会有限,可能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政治成为致富之道。当在政治外部缺少机会的时候,与脆弱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像暴力一样的腐败就产生了,其产生的渠道存在不可接受的行为(Huntington, 1968)。另外,从公共部门滋生的腐败和从私人部门滋生的腐败存在明显的区别。

从公共部门滋生的腐败指偏袒、通过政党或者海关官员抽取租金、公务员欺诈、示惠于政治拥王者、不正确的私有化、非法操作的采购合同以及勒索。一些公共部门内部滋生的腐败与私人部门无关;另外一些腐败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从私人部门滋生的腐败指非法的公司捐献、贿赂和礼物等等。例如,一个企业主捐赠礼物给公共官员以交换具有偏向性的法律和

规章的实施。技术引导性私人部门的扩展导致了滋生公共部门的腐败的减少,因为其有可能为从事腐败的公共官员提供外部选择(Ruhashyankiko和Yehoue, 2006)。Ruhashyankiko和Yehoue也表明了滋生公共部门腐败的下降超过由于私人部门扩展而引起的私人部门腐败的潜在增长。就是说,技术引导性的私人部门的发展和整体腐败的下降相关,这暗示反腐政策应该与私人部门发展的策略相结合。

“有利于信息流动和帮助有文化选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发展市民社会是关键性的。”

提高公共制度的透明度。如果缺少必要的信息以引起对问题的关注,市民社会将不会是有用的,因此需要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公共信息的披露制度,特别是促进财政透明度需要加强。预算应该遵循在制定计划、资源分配和执行方面的国际惯例。虽然许多非洲国家在财政透明度标准方面取得一些进步,而在其他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例如,在赞比亚,公共支出管理和财政责任项目与赞比亚政府合作出版的《2005年公共财政管理业绩报告》指出由于信息不充分和能力有限导致机构遵守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因为这些使预算较少透明,初始预算不是实际支出的一个良好预测。

类似的,虽然IMF的《财政标准观察报告》承认加纳在有些领域符合财政透明度标准,但也指出,“(1)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预算文件覆盖的范围不完全;(2)大量的预算转移到法定基金,这与中央政府的预算不相符合,有时只有很少的报告;(3)内部和外部审计无效率,导致粗忽大意和审计报告的堆积;(4)法律和规章以一种阻碍私人部门活动的方式执行”(IMF, 2004)。

另外,很少非洲国家有预算审核法,这个法律是控制预算执行和帮助辨别潜在腐败行为的基本工具。例如,在一些国家,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允许其使用非标准的预算惯例,因而法官能够很自由地将钱用于其私人目的。由于没有预算审核法,这样的职权滥用很难被发现。在贝宁,1999年开始实施的预算审核法揪出了一个腐败丑闻,许多法官牵涉其中,他们以权谋私从这种体制中转移钱财。

“鉴于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性，私营发展部门、市民社会组织（CSOs）以及公共财政机构都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尤其当对非洲的援助比例逐渐增多的时候。”

因此，建立审计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至关重要，这种机构对于正确使用预算是十分有益的。内外部的账目审计能力也要不断提高。审计办公室不但应该是独立的，而且还要配备受过良好训练的审计人员，因为预算审核需要相当强的审计能力。预算审核不仅应当是强制性的和及时的，而且结果的公布也极其重要。在议会中，通过强化专门委员会帮助改进执行人员的粗忽大意也是十分重要的。掌管预算审核的议会委员会尤其应该配备会计和审计方面的专家。在许多非洲国家，由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为专门的议会委员会提供的技术援助正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对采购活动进行改革及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以提高透明度同样重要，这样可以使公众更容易获得金融方面的信息。公共财政方面的透明度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机构根据正确的核查与平衡原则来加以推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更多的腐败信息传达给市民社会，使没有太多文化的选民能对其领导的责任重要性比较敏感。

援助输送的意义

我们的分析对于外部援助者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鉴于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性，私营发展部门、市民社会组织（CSOs）以及公共财政机构都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尤其当对非洲的援助比例逐渐增多的时候。

第一，援助要定位于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这或许可以通过促进合资企业、私营股份基金以及中小企业担保结构的出现来实现。可以通过实施一个类似于《竞争与创新规划》的特殊项目达到这样的目的，《竞争与创新规划》是由欧洲委员会创建的，目的是促进企业关系的调整和革新。

第二，一些资金应该分配到每个国家的新闻部门

和市民社会组织以促进言论自由和提高民间团体的活力。新闻部门和市民社会组织接受援助的一个标准是它们要独立于政府——在有些国家，这些部门从属于政府，充当政府宣传的工具。

援助应该给予市民社会组织，这样话，它们就可以收集信息，培训有关问题的投票者。接受援助的市民社会组织同样要受到监督。因此，应该进行由像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发展署及法国发展局这样的有关国际机构组织的阶段性调查以评估其实施效果。

第三，如果援助过去提升了内外审计能力的话，那么援助也能够使市民社会组织更容易地收集和发布信息。这些行动将使投票者更熟悉相关问题，因此他们能够促使那些没有采取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领导人负责任。这样的信息反过来又提高了这样的可能性：选举将能有效地监督那些公共官员。

Abdoulaye Bio-Tchané, IMF 非洲部主任，贝宁财政经济部前部长；Etienne B. Yehoue,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Bio-Tchané, Abdoulaye, and Philippe Montigny, 2000, Lutter contre la corruption: Un impératif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Bénin dans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Cotonou, Benin: Le Flamboyant).

Bratton, Michael, and Nicholas van de Walle, 1997,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lder, Matt,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04, "Africa: Dictatorial and Democratic Electoral Systems since 1946," in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Choice, ed. by Joseph Colomer (London: Palgrave).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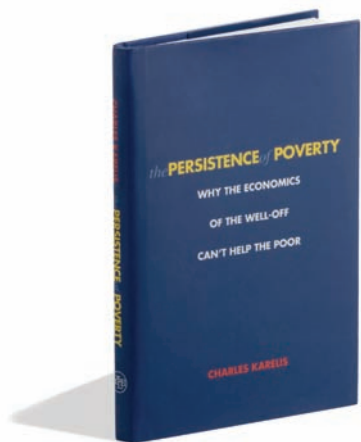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Ghana: Report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Fiscal Transparency Module, IMF Country Report 04/203, July (Washington).

Ruhashyankiko, Jean-François, and Etienne B. Yehoue, 2006, "Corruption and Technology-Induce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MF Working Paper 06/19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Yehoue, Etienne B., 2007, "Ethnic Diversity, Democracy, and Corruption," IMF Working Paper 07/21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Zambia,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National Planning, 2005, Zambia: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 Report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PF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port (Lusaka).

帮助穷人



Charles Karelis

贫困的持续

为什么富裕经济学不能帮助穷人

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和伦敦，2007年，208页，30美元（精装）。

即使富裕的国家也有很多穷人。虽然与贫困国家的穷人相比，他们的处境可能要好，但是与同一类别的人相比，他们的情况却坏了很多。结果，他们感觉被排除，没有力量。有的时候，贫困是残疾或者自然灾害的结果，但是很多穷人似乎陷入了不能充分就业、缺乏教育、药品滥用、犯罪的怪圈。在许多发达经济体，穷人常常不能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其他机会。

穷人是非理性的？

贫困的持续存在令人烦恼，不仅是因为我们同情穷人，同时也是因为贫困和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比如犯罪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令人疑惑的一点。因为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贫困的人有强烈的去寻找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或者更一般的讲，寻求改善他们生活机会的动机。如果你的收入比较低，你应该会对那些通过更长的劳动时间或者

教育的未来回报得到的额外的金钱有更高的价值评价。但是很多贫困的人的行为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理智。

乔治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教授 Charles Karelis 在他的这本令人关注的书中，就这个讨论不休的问题对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

为了解释贫困持续存在这个疑惑，Karelis 认为，我们应该修正消费边际效用通常随消费水平递减这个假设。他说，相反的是，当一个人面对贫困时，每一单位额外消费的边际效用是增加的。如果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增加一丁点的消费几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可以增加相当数量的消费，则会带来庞大的不成比例的益处。因此，穷人愿意改变消费，为摆脱贫困（至少是暂时摆脱）而冒险。

从直觉上判断，这个论证的过程有一定的道理。可以想想这样一个事实，穷人更倾向于购买彩票，即使彩票贡献的是一个负的期望回报值。他们购买彩票是因为有一个很小的改变命运的赢的机会。事实上，如果最大的奖是100美元的话，非常少的人会去买彩票，即使中奖人的数量会成倍的增加。同样的，如果你有很多伤心的事需要喝酒麻醉自己的话，喝下一瓶酒的诱惑比抿一杯葡萄酒的诱惑要大。

这一假设具有直接的政策建议。补贴穷人工资（例如，通过个人所得税返还的方式）的“就业即有报酬”的努力应该起到两层作用——其一，穷人更有理由以工作代替悠闲；另外，较高的收入本质上也会提高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的价值，从而赚取更多的报酬。然而，即使整齐的一沓沓钱给了穷人，提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依然可以增强穷人寻求就业和赚得更多报酬的动力（包括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并不是所有暗含的政策建议都值得喝彩。比如说，Karelis 的论证

逻辑中包含的自我努力，例如建立小额信贷制度或合作企业，如果没有实质的补贴，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这些人还是穷人，他们就会是很糟糕的存储者、借贷人和投资者，因为（理性的来讲）他们更愿意立刻消费掉。

**“如果你穷得叮当响，
增加一点消费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本书里的小额信贷的例子暗示了当消费的边际效应如假设那样增加时的物理性缺乏，和将贫困定义为一种与授权不足相关联的相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在 Karelis 的举例中，他强调的是物质上的贫困。但是，如果美国的穷人缺乏最多的是对他们的尊重或在别人眼里的尊重呢？所以，这样的话，补贴和其他的帮助都不会对他们的境况有很大程度的改善，甚至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

在 Karelis 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其他一些对贫困为什么持续存在的解释（例如机会缺乏）也能得出类似的政策建议。但是读者——尤其是如果他或她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可能会为作者只是依靠文字和一些简单的图表而感到失望。事实上，在这里提到的一些评价应该通过对主要假设和各种选择之间的对比进行更严格的陈述，之后通过实证检验等方法加以巩固。

不过，这些建议无损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任何关于贫困持续存在的解释以及据此设计的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贫困本身在穷人的激发因素中所起的作用。

Daniel Hardy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

评 年 阐释持续发展学



Mohan Munasinghe

让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持续发展学框架和实际应用

MIND 出版社，科伦坡，斯里兰卡，2007年，650页，40美元（简装）。

套上了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标签后，起初，很多分析家只是努力寻找一个一致认同的好的定义，来解释这个概念在实践中是什么意思。很快，其他一些问题接踵而至，包括如何发展相关因素的定量测评方法，如何找到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解决经常冲突的目标以及如何解释为什么很多明显可以实现更进一步可持续化发展的“双赢”的解决办法没有起到拉动作用呢。最近，一个大的挑战是可持续发展这个包罗万象的分析框架中将气候变化也包括了进来。

Munasinghe教授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副主席，最近他和他的同事一起与阿尔·戈尔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长期以来，他都坚定地支持将发展涉及的经济、人类和环境各方面放在一起。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叫做“持续发展学”。这本书概括了这一理论的进展和持续发展学的实践，是一个非常详实的文献研究的成果，通过案例研究生动地进行了解释。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Munasinghe解释了支撑持续发展学的错综复杂的关联。让人并不惊奇的结论是，似乎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像测量经济发展那样测量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Munasinghe提供了一些可选的方法——离完美还有一些距离——帮助将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考虑进去进行分析。他讨论了长期问题负贴现率的分析边界，在某一方面，甚至似乎预见了近来出现的寻求建立一种可以根据环境变化科学而进行分析的经济学理论“斯特恩评估——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理论应用

告诉了我们持续发展学的局限性之后，Munasinghe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通过优秀的、不同类型的案例分析讲述了很多令人激动的事情。

这些案例证明，这一分析框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应用并提供很强的结论。比如说，我们知道了玻利维亚目前是非可持续性发展；知道每处理一单位温室气体的排放可以产生最大的平均福利所得。

这本书还对斯里兰卡的交通部门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从技术、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维度对污染的健康成本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量化分析。书中的有些结论是违背常理的——例如，其中一个案例得出的结论是反对铁路电气化——这只是为了强调支持决策制定的好的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前方更明亮的时代

自始至终，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Munasinghe的乐观：随着收入提升，环保意识增强，进而促进更好的政策的制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富人造成的环境恶化是穷人的20—40倍，更高的收入真的对环境有帮助吗？或者富裕国家会简单地将污染转移到贫困的国家或者某地区和全球公民？

在寻找有力答案的过程中，作者最基本的真言是将环境和社会成本内部化、消除导致恶化的市场失败、自然资源定价应包括所有的外部性。这个真言可以通过阐述得很清楚的分析工具得到支持。但是为什么真言很少被应用呢？根据Munasinghe的论述，能减弱污染损害的环境改善的成本只占投资成本的5%。这使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多数城市的污染水平没有显现一丁点下降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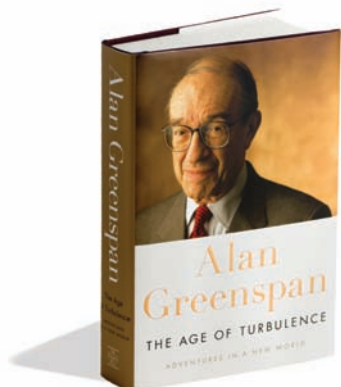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通过书中的分析工具、现实世界的应用案例以及出色的参考书目，这本书可以极好地为政策分析服务。但是，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他可能不会觉得得到了很好的服务，他必须努力地寻找翻阅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本书指出但是没有很强调治理，尽管他也承认在持续发展中不存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可以控制所有相关杠杆的政策制定者，不存在单一的标准和清晰的计量单位。权力寻租者——靠自然资源生活，破坏合法的行政程序的人——的力量是传奇性的。那些或许希望事情变得不一样的人，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没有出生，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根本不能唤起任何改变。

Munasinghe希望能通过价值、信心和信仰，更好地激发出为未来一代保护环境，推翻当前不可持续唯物主义观点的想法。或许，在这个过程中，Munasinghe忽略了对了解这些知识后的拥护者的作用和发生改变的过程中积极的法律制度上的关注和举例。

Anand Seth
南中欧国家局局长
世界银行

原味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

骚动的年代

新世界的冒险

企鹅集团，2007年，531页，
35美元（精装）。

在一次新书推介会上，格林斯潘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有什么感觉。“或许，有点头脑轻飘？”提问者询问。格林斯潘回答说“不，是肩膀一松”。阅读这本书，你可以体会到格林斯潘在做了将近20年的决策和命令之后，最后写出近20万字描述他的选择的那种安慰。

这本书可以被均分为一本自传和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短文。前者本身就是一本书，能够吸引人读下去。格林斯潘以一种简单但是吸引人的方式讲述了他一生中的故事。他在纽约长大，之后迷上了数学和音乐，还有纽约扬基棒球队。他在书中写到，“通过计算打击率我学会了分数：11中3个就是0.273。”

从爵士音乐家到经济学家

起初，格林斯潘是想成为一个爵士音乐家。在和 Henry Jerome Orchestra 一起的巡回演出时，他被称为“乐队的聪明人”，因为他可以看得懂股票市场和金融方面的书。放弃在音乐上的职业发展转而研究

经济学不是很长的过程。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弗里·摩尔和亚瑟·伯恩斯在早期对他产生过影响。从摩尔那里，格林斯潘对美国的具体细节产生了兴趣，而从伯恩斯那里，格林斯潘学到了市场有能力自我修正的理念。格林斯潘对自由主义的支持通过他称之为“思想的会面——主要是我的思想遇到了她的思想”——和哲学家恩雅·兰特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格林斯潘以企业咨询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的咨询公司——Townsend-Greenspan——赢得了美国蓝筹股公司中的一些客户。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写了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这增加了政治圈对他的关注。格林斯潘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任职期间担任了多种职位的工作，但是里根总统，在1987年任命了他这一生中的重要角色——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从崩溃到泡沫

在格林斯潘任职的早期，他对市场具有自我调整的信心就在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崩盘中受到了考验，当时股票市场的单日损失是历史上最大的。格林斯潘发表了不典型，但很明确的一句话声明，宣布联邦将为市场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以维持其最终借贷人的作用。“它就像盖茨堡地址那么简短明了”他说，“虽然可能起不到刺激作用。”1987年经济崩溃之后的几年里，格林斯潘继续受到考验。他后来承认了1990年的经济萧条以及在降低利息方面可能做得太慢了。当然，这是前任总统乔治·布什的观点。布什曾这样对格林斯潘的继任者说，“我重新任命了他，但是他却令我失望。”

格林斯潘在克林顿时代很有业绩，因为他有效地控制了财政赤

字，维持低通货膨胀预期以及长期的低利率。格林斯潘将值得赞许的财政政策和日渐熟练的对货币政策控制结合得很好。因为坚信通货膨胀正在缓和，1994年格林斯潘指示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提高利率，实现经济降温但非萧条——软着陆。接着，他降低利率，经济再次加速增长，但是却几乎没有多少通货膨胀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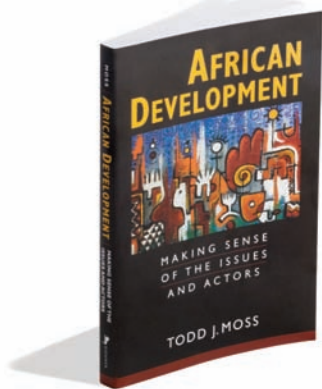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发表了令人信服的一番言论，他声称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生产力井喷时期，不过政府的统计学家和学术界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列举的证据帮助格林斯潘说服在美联储的同僚同意将利率保持在比其他可能实行的利率要低的水平。

不过，低利率和他对所谓新经济的拥护也促使股票市场上的泡沫进一步形成。尽管格林斯潘在他著名的一场讲话“非理性繁荣”中试图警告股市出现的泡沫，但是最终他认为联邦没有能力实时确定是否存在泡沫以及如果刺破它。

出色的击球率

他在书中的评论部分表达了对美国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改革的滞后、公司丑闻爆出之后开始的维持管理平衡的努力以及美国“对石油过度依赖”等问题的深度关注。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实施了那些成功的策略，美国的经济可能远比现在更糟糕。前任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的对，他将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比喻成“在中心场地用米奇·曼托换下乔·狄马乔才能成就纽约扬基队美好的未来”。像棒球运动一样，在指导货币政策过程中，伟大，不要求一定达到1.000的击球率。

Prakash Loungani
IMF 对外关系部处长



Todd J. Moss

非洲的发展

了解问题与行动者的意义

Lynne Rienner 出版社, 博尔德, 科罗拉多州, 2007年, 250页, 22美元 (简装)。

撒哈拉以南非洲刚独立的前几年充满希望, 具有国际发展性的行业很快凸显出来帮助这些新的国家。但是众所周知, 这个地区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虽然最近经济增长有所好转, 但多数国家到2015年不大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Todd Moss 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或是能清楚解释为什么非洲的经济表现如此之差的答案。相反, 这本书“希望能对当前非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趋势和参与者进行一个简单, 但是希望不是简单化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本书基本上是成功的。

“大人物”和糟糕的遗产

Moss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快速地算了一笔账, 从对殖民主义的残余、“大人物”的作用和个人统治、冲突与内战以及当前的政治

动荡和民主化几个方面开始进行回顾。他列出一些核心的发展问题, 包括增长缓慢的困惑、经济改革中的问题以及国际援助的作用。在结尾部分, 他讨论了地方主义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这本书有四个论题。第一, 撒哈拉以南地区有着一段不幸的历史, 而目前又面临着很多阻碍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发掘和利用这个地区其他的优势, 消除障碍。第二, 改造非洲国家政府, 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资源管理能力。这是吸引更多援助的关键。第三, 援助应该加大, 但同时也应该更有效率。最后, 撒哈拉以南地区和整个世界应该共同承担起让前者能够利用全球经济机会的责任。

Moss 强调, 我们对发展的进程和如何使援助有效知之甚少。他擅长于陈述不同, 有些时候甚至是相反的观点。一直以来, 他都寻求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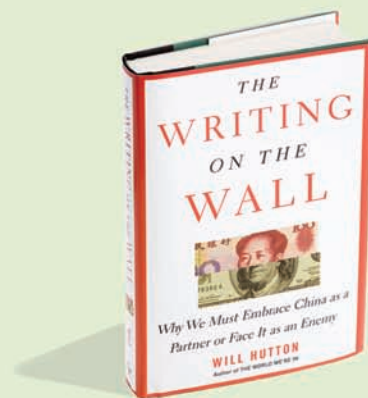
中国的崛起

中国从一个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传奇之一。事实上, 这个转变的意义重大, 进而促成这样一个问题: 21世纪是中国的, 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 而19世纪是英国的一样? 在经济学家、记者Will Hutton所著的《灾难即将来临》一书中, 他用经济和政治文献中不常用的叙事方式, 很直接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经过很好地研究, 虽然推理过程有时不乏肤浅, 但是很清楚。

事实上有两本书。一本涉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分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前景。将讨论转移到这

里, 对讨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优势来说有点不是很合适。

对于任何一个想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和挑战有一个清楚准确了解的读者来说, 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能很好地找到答案。Hutton以简短但是明晰的中国历史及其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起头。这段历史涵盖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困难, 包括早期生产资料的集中再分配、大跃进、极端平均主义政策。这个时期的政策失误使得大家一致认识到经济改革的必要。1978年, 邓小平这个现代中国的建造者, 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一系列废除中央计划经济, 允许市场行为的改革成就了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浪潮。在新的世纪里, 中国开始实行外部贸易自由化,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外国投资的浪潮也在一夜之间帮



Will Hutton

直面困境

我们是把中国视为伙伴来拥抱还是将其作为敌人来面对

Simon & Schuster Trade 出版社, 纽约, 2006年, 432页, 28美元 (精装)。

助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品集中地。在Hutton的叙述中有很多真知灼见。与东欧相比,

么解释这些问题，而非提出解决的“妙药仙丹”。

但是这种“调查式”的方法存在着不利之处。Moss对文章中不同的观点并不总是给出坚决的态度，导致读者很疑惑到底相信什么。例如，为什么“自然资源灾害”会导致冲突？是因为对收益的争夺、缺乏责任感、还是脆弱的制度？

有些时候，Moss本人似乎也有些矛盾。比方说，他在讨论种族主义和冲突的时候提出，种族主义不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讨论统治的其他替代形式以及它们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时，Moss又部分地认为，“非洲过去和目前的多数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有种族或者语言的原因。”

令人惊讶的是，在关于非洲经济增长缓慢的章节中，作者并没有探究这些国家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例如原油和钻石这一情况。而

这原本有助于理解这些国家面对的独特挑战。

在讨论经济改革和政治调整时，Moss有时候不太确定自己主张什么。一方面，他声称条件性（比如，与IMF贷款的联系）“几乎完全失败”；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结构性调整明显改善了非洲的宏观经济管理。不清楚的是条件性所起的作用。目前，在非洲政策制定者之间很少讨论第一代的那些改革，比如说，是志在取得财政规范还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改革，帮助创造了目前该地区强势的增长环境。

贸易的角色

Moss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方面给予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是他关于地区间贸易潜在利益的讨论却令人失望。他应该强调大量的地区贸易安排在

促进该地区内的贸易繁荣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现在，该地区有超过30项此类贸易安排，每个国家至少属于其中的4项。效果互相重复，有时各义务之间甚至相互冲突。

复杂、限制性的规则，连同其他内部壁垒一起，使得该区域内贸易与其他发展中区域相对较低。

除了这些缺点外，对想了解非洲发展的学生而言，这本书是一本优秀的初级读物。对那些希望进一步钻研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每章后面进一步阅读的部分提供了额外的资料。

Calvin McDonald
IMF非洲部顾问

通往市场经济的路途没有从谷峰到谷底的大跌宕——更确切地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注重实效、渐进的、从谷底向上的（或者就如Hutton认为的，逐步的、不断作用的）改革方式，就像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策略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解释中国的很多成功，尤其小乡镇企业惊人的繁荣，巨大的能够维持持续投资的储蓄资源以及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增长时，Hutton也在强调机遇的作用。

如果说改革阶段的成功被放在聚光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也一样。受市场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影响，同时它还面临着因为收入不均、腐败、滥用土地、环境恶化导致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压力也逐渐凸显出来。来自海外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威胁着中国出口的扩大，然

而产量的急速增长依靠的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投资，而不是靠效率的驱动。

在目前这种经济和政治压力

“Hutton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改革对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下，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业绩还能继续吗？Hutton的回答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向前发展。

除了市场改革，政府仍控制着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杠杆，其范围广泛，从银行体系——支撑着对大型工业部门的投资——

到私人经济。实际上，中国政府相信这样的控制对于保证短期的高速增长是必要的，对维护稳定很重要。

如果中国政府不注重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动力问题，将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生产力低、创新少的经济体。给机体补充燃料要求建立那些伴随西方社会成功发展而存在的“软性的”制度上的基础组织：公平的法院、清晰的财产权、独立的银行和审计师、出版的自由、有效的公司治理、免费的知识调查。Hutton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改革对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决定着世界会对中国世纪做出何种反应。

Brian Aitken
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副处长

(粮食) 价格的成功

对卡路里更高的全球需求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更多问题

澳大利亚的小麦、中国的猪肉和美国的玉米，这三种特定商品与宏观经济有怎样的关系呢？不幸是，现在，大量的粮食商品在许多方面是全球紧密相连的。

过去的12个月，世界经历了以较高的粮食价格为主要形式的大幅度通货膨胀的冲击。这一冲击并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更高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大部分国家的货币政策似乎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但通货膨胀还是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国家相对贫困的城市居民。

可能有两种令人鼓舞的前景：低收入国家农民的直接收益以及在富裕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潜在的政策空间。

粮食价格上涨的冲击主要源于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对于目前的一段时间，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这一点在燃料和金属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商品价格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全球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最近5年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当然，相当大部分的全球持续增长在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强劲增长。

更高的商品价格会引发供给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有些滞后，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全球经济活动增长中获益。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部分情况可能是全球持续繁荣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

其中也有气候的影响。全球部分地区遭遇严重的旱灾，其他地区动物疫病也对粮食价格有一定影响。

生物燃料政策也是造成粮价上涨的原因

但最近以来，粮食价格急剧增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国家积极鼓励使用所谓的生物燃料。生物燃料是一种可再生的能源，也就是说，你从玉米中提取乙醇，将乙醇与汽油混合驱动你的汽车，同时能够种植更多玉米。作为一种确保能源安全的手段，生物燃料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能够使能源的来源多样化。

不幸的是，生物燃料的优点有时被加以夸大，其负面效应已变得日益明显。从玉米中提取乙醇并不能产生大量的净能量——你制造和运输乙醇所用的汽油与由乙醇所转化的汽油相当。而且这样并不能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却使玉米的价格上涨。

过去两年，玉米价格明显上涨，不管美国还是世界范围的玉米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在最近几个月有稍许降低）。随着将空闲土地由种植小麦转为种植玉米，对其他农作物也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点在欧洲最为明显，欧洲不再进行奶制品的生产，转而种植可用于生物燃料的农作物（如油菜籽价格也急剧增长）。据IMF委员会评估，最近粮食价格的增加的大部分原因直接与生物燃料政策有关。

对于生物燃料而言，这些措施的关键是农业保护主义。包括巴西在内的许多国家能够以更加廉价的方式生产乙醇，同时能够更多地节约不可再生能源并减少排放，例如通过糖。但这种通过糖生



Simon Johnson, IMF 研究部主任、经济顾问。

产的乙醇受到美国保护性关税的影响（在欧洲存在相似障碍）。此外，为鼓励这些部门创新，富裕国家的生产补贴似乎已过多给予美国的酿酒行业。鼓励创新是一种好的观念，例如，在印度采用“麻疯树”显示了极大的潜力，但仍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才能使之变为现实，而且在这些部门还有更有效的方法鼓励研究和发展。

并且后果是……

因此，如果工业国家粮食价格的波动很大程度是受生物燃料政策的影响，那么谁将面对这样的后果呢？首先，工业国本身并不能免受粮价冲击的影响。美联储（指导美国的货币政策行动）在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时并未包括粮食价格，但这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通常是不稳定的。然而，如果粮食价格一直上涨，由于将粮食用于生物燃料或其他一些原因，也存在将粮食价格包括在核心通货膨胀中加以度量的可能（一些工业国的中央银行在度量通货膨胀时已包括粮食价格在内）。

然而，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粮价上涨对富裕国家的影响将受到限制。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粮食在人们消费中只占相对较少的部分——平均约为10%~15%，而且其中一部分消费与粮食的处理和分配有关而不是与原材料有关——从而使粮价只占消费者价格指数很少的一部分。

在许多较贫困国家，粮食占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大的部分。例如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粮食约占消费者购买消费品总量的30%，在许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约占50%或更多。这意味着玉米、小麦、牛奶和肉类价格同样的全球增长，将迅速导致较贫困国家更高的通货膨胀。

而且，这意味着在中等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将采取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较高的利率——而不是采取相反的政策，当然，也可能实施非基于市场的政策，如可能使价格扭曲的价格控制，从而可能增加较贫困国家和较富裕国家的利率差，并使利率降低。这将使所谓的全球套息交易增加，即人们以利率相对较低的货币借贷（如日元），并以利率相对较高的货币投资（例如发展中国家货币）。

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穷国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如果以正确的形式和预有准备的速度流动，将有助于发展。但关于金融全球化，IMF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良性发展警告：如果过快、过多并以一种自由的方式获得资本，可能将对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是坏消息

对城市地区穷人是真正的坏消息。除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外，较高粮食价格对于这部分人的影响，是直接且非常痛苦的。城市地区的穷人需要为他们的吃饭问题掏更多的钱。随着许多较贫困国家人口的增长，日益增长的粮食价格将对极度贫困国家的预算施加更大压力。自身能够生产足够粮食的人们和市场可以从中获利（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费的粮食价格），但城市穷人和许多农村穷人正在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令人鼓舞的前景是什么？

各地的农民包括较贫困国家的农业部门可能获利最多。当然，城市居民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对每一国家的影响将有所不同。

在这样迅速变化的困境中也可能会有另外的机会。富裕国家各种农业补贴长期困扰国际贸易体系，并使当前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变得困难。富裕国家不愿改善进入其受保护程度最高市场的道路。

由于较高的粮食价格，补贴的强制性较少——这取决于补贴构成的方式——当价格高于某一固定水平时可能不需要进行补贴。工业国需抓住这一时机并以此种方式消除补贴，通过此种方式很难随后再向他们进行征收。

尽管欧盟并不总是被视为农业改革的模范，然而就牛奶出口补贴而言，欧盟已采取一种引人注目的措施。由于牛奶在今年保持有记录以来较高的价格，欧盟的这些补贴已经暂停。由于制定农业政策的特点，恢复这些补贴可能是困难的。

但工业国关于乙醇的关税也应当下降。富裕国家不断警告穷国增加农业部门的价值。这也是快速发展的全球生物燃料市场所带来的。但除非进口到富裕国家的关税被取消，否则这一切将不会发生。这里没有任何万能药，当然，生物燃料采取更自由的贸易方式一般而言有助于各地的农业部门，并能为穷人、农村社会带来福利。如果所有国家在生产生物燃料方面拥有同样公平的机会，扩大土地利用的机会将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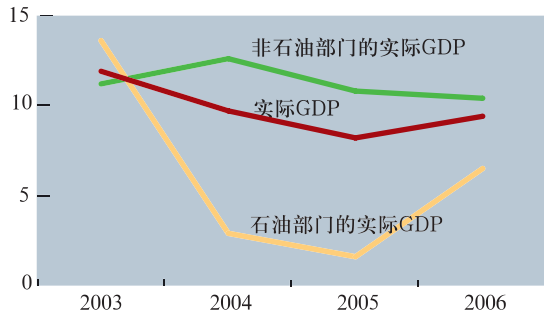
欲获得更多详情，见2007年10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专栏1.1和专栏1.6以及我们最近的金融全球化论文：www.imf.org/external/np/res/docs/2007/0607.htm。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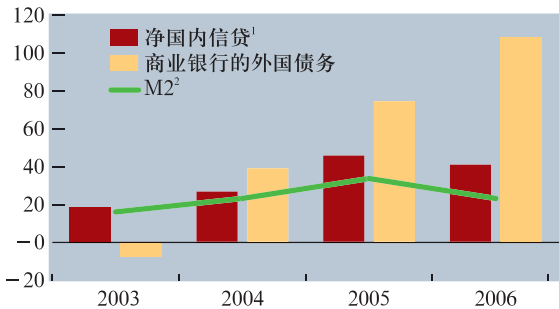
近几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按任何全球标准衡量都是引人注目的。目前的挑战就是要解决带动通货膨胀的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同时还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过去的4年，高的石油价格和非石油部门快速的扩张推动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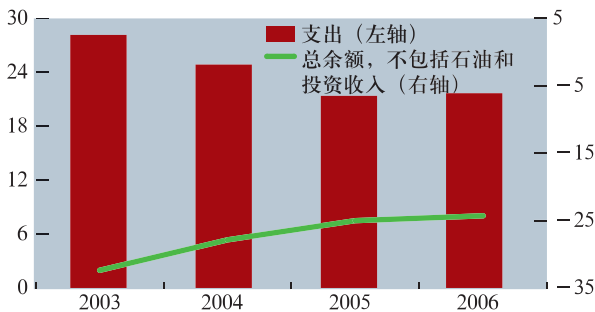
私人部门信贷也迅速增长，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内资源以及外国贷款。

(变动百分比)



……但是财政政策依然保持谨慎，正如支出相对于GDP的下降以及非石油部门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下降所表明的。

(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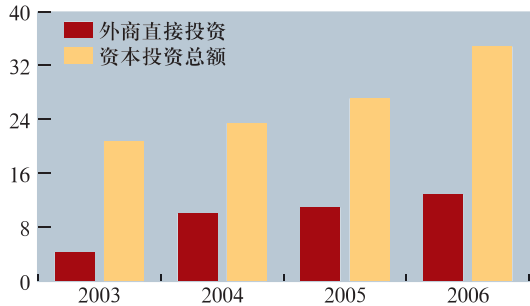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方和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¹包括对政府的债权(净)、对国有企业的债权以及对私人部门的债权。

²包括银行外的流通货币、迪拉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外币存款。

³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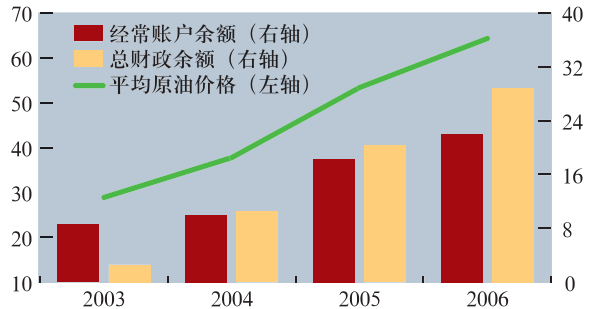
随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逐步以服务业为导向，旅游业以及其他部门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迅速大幅度增长。
(十亿美元)



创纪录的高石油价格带来了经常账户余额和财政余额的增加，进而有利于官方外汇资产的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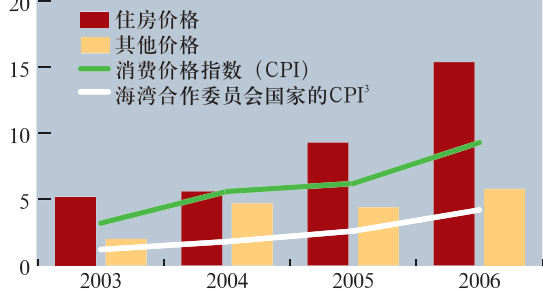
(美元/桶)

(占GDP的百分比)



然而，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住房供给短缺问题却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该地区的其他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其通货膨胀率更高。

(变动百分比)



A

Ehtisham Ahmad, 大, 还是太大? 9月号
 Mary Amity 和 Caroline Freund, 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 9月号
 Jonathan Anderson, 解决中国再平衡难题, 9月号
 Jahangir Aziz 和 Steven Dunaway, 中国的再平衡行动, 9月号
 Zeti Akhtar Aziz, 观点: 亚洲转型的十年, 6月号

B

返归基础: 购买力平价与市场: 哪个更有份量? 3月号; 小额信贷: 穷人的银行, 6月号; 为什么是实际汇率? 9月号
 Axel Bertuch-Samuels 和 Parmeshwar Ramlogan, 欧元: 愈加全球化, 3月号
 Abdoulaye Bio-Tchané 和 Etienne B. Yehoue, 非洲缺少的因素, 12月号
 David E. Bloom, 全球医疗卫生治理, 12月号
 David E. Bloom 和 Tarun Khanna, 城市变革, 9月号
 James M. Boughton 和 Colin I. Bradford, Jr., 全球治理: 新参与者、新规则, 12月号
 François Bourguignon 和 Mark Sundberg, 直言不讳: 援助能够发挥作用, 3月号
 Harry G. Broadman, 将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 6月号
 David Burton 和 Alessandro Zanello, 亚洲: 十年之后, 6月号
 Mayra Buvinic 和 Elizabeth M. King, 聪明的经济学, 6月号

C

Tim Callen, 返归基础: 购买力平价与市场: 哪个更有份量? 3月号
 Luis A.V. Catão, 返归基础: 为什么是实际汇率? 9月号; 后向预测: 拉丁美洲, 12月号
 Joe Cerrell, Helene Gayle, J. Stephen Morrison 和 Tore Godal, 观点: 全球医疗卫生系统坏了吗? 12月号
 Un-Chan Chung, 观点: 韩国: 寻求新的契约, 6月号
 Stijn Claessens 和 Erik Feijen, 从信贷到农作物, 3月号
 Benedict Clements, Christopher Faircloth 和 Marijn Verhoeven, 正确安排支出, 6月号
 Carlo Cottarelli 和 Isabelle Mateosy Lago, 帮助全球经济保持健康, 9月号
国家聚焦: 澳大利亚, 3月号; 保加利亚, 6月号; 墨西哥, 9月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2月号
 Li Cui, 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依存度, 9月号
 Stefano Curto, 图表释义: 改变援助面貌, 12月号

D

Uri Dadush 和 Julia Nielson, 全球贸易管制,

12月号

Randall Dodd, 次级债: 一次危机的触痕, 12月号
 David Dollar 和 Shang-Jin Wei, 未能充分利用的资本, 6月号

E

Mohamed A. El-Erian, 观点: 应对全球性资金流动, 3月号

G

Indermit S. Gill 和 Homi Kharas, 回到快车道, 3月号
 Mangal Goswami, Jack Ree 和 Ina Kota, 图表释义: 全球资本流动: 无法克服的严重问题, 3月号
 Sanjeev Gupta, Catherine Pattillo 和 Smita Wagh, 让汇款为非洲的发展做出贡献, 6月号

H

David Hofman, 控制灾难迫在眉睫, 3月号
 Hu Xiaolian, 观点: 中国的改革路径, 9月号

J

Ulrich Jacoby, 携手并进, 6月号
 Florence Jaumotte 和 Irina Tytell, 劳动力的全球化, 6月号
 Simon Johnson, 直言不讳: 主权财富基金增长, 9月号; 粮食价格的成功, 12月号

K

M. Ayhan Kose, Eswar Prasad, Kenneth Rogoff 和 Shang-Jin Wei, 金融全球化: 别再指责, 3月号
 Ina Kota, 返归基础: 小额信贷: 穷人的银行, 6月号

L

Maureen A. Lewis 和 Marlaire E. Lockheed, 让所有女孩回到学校, 6月号
 Leslie Lipschitz, 了解金融, 3月号
 Prakash Loungani, 经济学人物: 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 Robert Barro, 9月号

M

Paolo Mauro 和 Yishay Yafeh, 未来的金融危机, 12月号
 Matthew Maury, Kishore Mahbubani, Ramesh Ramanathan 和 Swati Ramanathan, 观点: 在管理大城市方面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9月号

P

Ceyla Pazarbasioglu, Mangal Goswami 和 Jack Ree, 投资者变脸, 3月号
经济学人物: Guillermo A. Calvo, 3月号; Robert Barro, 9月号; Michael Kremer, 12月号
图表释义: 全球资本流动: 无法克服的严重

问题, 3月号; 劳动力的全球化, 6月号; 城市的演变, 9月号; 改变援助前景, 12月号
 Eswar Prasad, Raghuram Rajan 和 Arvind Subramanian, 资本悖论, 3月号

R

Martin Ravallion, 城市贫困, 9月号
 Yaga Venugopal Reddy, 观点: 驯服老虎, 3月号
 James L. Rowe, 经济学人物: 经济学家: Guillermo A. Calvo, 3月号

S

Patrick Salyer 和 David E. Bloom, 图表释义: 城市的变迁, 9月号
 Janet G. Stotsky, 制定预算要考虑女性, 6月号
直言不讳: 援助能够发挥作用, 3月号; 主权财富基金增长, 9月号; 粮食价格的成功, 12月号
 Arvind Subramanian, 经济学人物: Michael Kremer, 12月号

T

Bob Traa 和 Alina Carare, 政府的净资产, 6月号

书评

Alberto Alesina 和 Francesco Giavazzi, 欧洲的未来: 改革抑或倒退, 6月号
 Courtney Blackman 爵士, 经济管理实务: 加勒比视角, 9月号
 Travis Bradford, 太阳能革命: 全球能源工业的经济转型, 3月号
 Filippo Cesarano, 货币理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 3月号
 Barry Eichengreen, 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 协调式资本主义其背后, 3月号
 José A. Gómez-Ibáñez, 基础设施管制: 垄断、合同与因地制宜, 6月号
 Alan Greenspan, 骚动的年代: 新世界的冒险, 12月号
 Will Hutton, 直面困境: 我们是把中国视为伙伴来拥抱还是将其作为敌人来面对, 12月号
 Dr. S.B. Jones-Hendrickson, 东加勒比国家经济组织论文集, 9月号
 Charles Karelis, 贫困的持续: 为什么富裕经济学不能帮助穷人, 12月号
 Rosa Maria Lastra, 国际货币稳定的立法基础, 9月号
 Paolo Mauro, Nathan Sussman 和 Yishay Yafeh, 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 1870—1913年以及今天的主权债利差, 6月号
 Todd J. Moss, 非洲的发展: 了解问题与行动者的意义, 12月号
 Mohan Munasinghe, 让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持续发展学框架和实际应用, 12月号
 Avinash D. Persaud 和 John Plender, 道德规范与金融: 寻找当今经商的道德规范, 9月号

区域经济展望： 目前已经覆盖全球



应对经济的脆弱性、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并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这些重要的地区展望报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和金融调查系列丛书的一部分。IMF每半年出版一次《区域经济展望》(5部),其中涵盖中东和中亚地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西半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欧洲。在每个地区的每卷中,地区近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展望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的,对于单个国家来讲也是这样。每个报告都包括该地区每个国家的数据。对于那些可能影响该地区经济业绩的经济政策决策本书并没有涉及,而是讨论了政策决策者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全书通篇主要分析了短期的展望、重大风险及其相关的政策挑战,特定的章节还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例

如资本流入的演变规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商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对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展望。这些对近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前景必不可少的调查都是部门内部关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广泛交流的成果,而这些信息都是工作人员通过对实施监管的成员国和存在贷款业务的成员国咨询得来的。

《区域经济展望》单本价格31美元(会员价格:26美元),欲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imfbookstore.org/fp/p0712GNO-FD, 大约50页,简装。

欲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或者订购图书,请登陆网站 www.imfbookstore.org/fp/P0712GNO-FD,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 publications@imf.org, 图书优惠代码 P0712GNO-FD。